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年輕男同志的危殆工作與親密生活

The Precarious Work and Intimacy of Young Gay Men

鄭宇廉

Yu-Lien Cheng

指導教授：黃克先 博士

Advisor: Ke-Hsien Huang, Ph.D.

中華民國112年8月

August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年輕男同志的危殆工作與親密生活

本論文係鄭宇廉君 (R08325009) 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所
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2 年 6 月 12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
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藍佩嘉

(簽名)

王宏

費克先

(指導教授)

謝辭



論文得以完成，我衷心感謝許多人，無論是物質上的關愛或精神上的陪伴。首先要感謝家人給予完全的支持與理解，尤其母親從小講述的屏東往事，讓我對底層研究始終抱有嚮往，在大學與碩班期間選修了貧窮社會學，開啟對田野工作的理解，並確立以貧窮男同志為研究課題（當然後續又經歷修修改改的過程）。

再來要謝謝指導老師克先老師，給予我探索主題的空間，且總是精準指出研究盲點並導引方向，給予我智識上與經濟上的莫大支援。我也要感謝嘉苓老師在審查計劃書時提供的關鍵文本，對後續研究比較產生啟發；謝謝身為口委的佩嘉老師與宏仁老師，兩位溫暖而豐富的建議讓這本論文得以變得更加嚴謹；東海大學的彥寧老師在本研究剛起步時的邀約、讀書會及書籍推薦，也讓我感到備受鼓勵。研究所期間，也感謝明修老師、貞蘭老師、仲恩老師、法律系的昭如老師，以及中研院的國雄老師與劉文老師等人的教導。至於研究所期間的生計，我非常感謝克先老師、城鄉所的恆達老師與中研院亞太中心的育生老師聘我作助理，工作的過程也學習良多。

社會所的朋友們也伴我度過這趟（笑中帶淚的??）旅程。特別要感謝同屆的旆君、明珊、Sam、可祐與高睿，下一屆的怡菁、語謙、美好、恩亞、映卿、Ash，下下屆的峰瑞與寓婷，以及庭碩、心平以及宇修學長等人。生傳系的老友們柏毅、冠好及怡安、後蕩女子力孟熹與東翰，及高中母姊會的旻諺、正宏和維安，都讓我感受到研究所外的新鮮、帶來觀點上的刺激。碩班期間的讀書會則讓研究變得更加聚焦與嚴謹，感謝庭瑋組織了魔鬼試煉，也特別謝謝靖芸、暉旭、珮瑜及芷穎的悉心討論。

倒數第二段獻給明宗，你的陪伴是最大的支持。遠在法國，但你常在我心。

最後感謝所有報導人願意交付私密的生命故事，包含許多想來酸澀的回憶，尤其是阿力，第一位，也是交情最深的一位報導人。夜半書寫，我總會思考你如何看待這些故事，多希望寫完後能再向你請教。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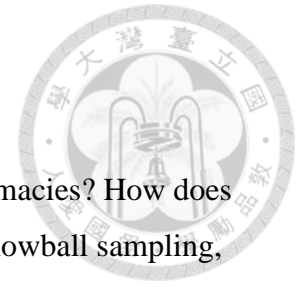
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他們如何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此過程又與中產階級男同志有什麼差異？為了理解上述提問，本研究採取訪談法與田野參與觀察，在田野地透過滾雪球抽樣徵得七位主要報導人，他們年屆 23 至 33 歲、自我認同為男同志、原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以下，且現在職業為非典型工作或收入低於等於法定基本工資。

研究發現，在初步參與圈內社交時，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在網路或實體空間均遭遇先於「性感階序」的階級排除機制；在後續的長期社交中，原生家庭貧窮的經驗改變了報導人對「情愛消費」的意義詮釋，使他們越是承蒙砲友的經濟照料，越是感到尊嚴受損；在經營交往關係時，報導人應對危殆工作而發展出的勞動調適策略，使交往雙方原先預期可在關係中獲得的元素消失，因而促發雙方針對性愛、情感、勞動與金錢花用進行對等或不對等協商，此過程改變了親密關係的形式，使得原先抱有一對一式親密關係理想的男同志們進入了開放式關係。

總結來說，面對危殆工作與危殆性、面對來自現實生活的考驗，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們並不傾向直接解編親密關係，而是嘗試協商拼裝親密關係的多項元素，將其調整為性愛或情感方面的開放式關係。本文挑戰了視男同志親密關係為純粹關係的觀點，同時發現男同志親密關係的腳本正逐漸邁向異性戀式的婚姻經濟想像，經濟權力或將成為當代男同志親密關係的重要課題。

關鍵字：男同志、危殆工作、危殆性、親密關係、開放式關係、關係工作、經濟權力

Abstract



How do precarious young gay men (PYGM) build and maintain intimacies? How does this process differ from that of middle-class gay men? Employing snowball sampling, seven key informants, aged 23 to 33, self-identifying as gay, and originating from working-class families, were enlisted. Their present occupation encompassed precarious work or positions yielding remuneration equal to, or below, the minimum wage.

Utilizing a combination of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this study unveils several pivotal insights. Primarily, dur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ongzhi datings, whether through virtual platforms or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PYGM often confronted an exclusionary mechanism rooted in socioeconomic class, predating the “sensual hierarchy.” Furthermore, the informants’ interpretations of “loving consumption” were intricately shaped by their past experiences of precarity and class contempt.

Consequently, an ambivalence towards accepting economic caring and loving consumption from others engendering sentiments of shame. Lastly, the intimacies of PYGM underwent intricate transformations due to their adjustments toward precarious work. These adjustments stimulated a multifaceted negotiation of intimacy encompassing sex, emotion, work, and the way of spending. Consequently, this trajectory led certain PYGM, who previously held monogamous ideals, to gravitate towards open relationships.

To sum up, faced with precarious work and precarity, PYGM tend not to end intimacies directly, but try to negotiate and assemble multiple elements of intimacies, forming open relationships that are sexually or romantically open.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e view that gay men’s intimacies are pure relationships, and also finds that the social script of gay men’s intimacies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a heterosexual marriage-economic imagination, thus making economic power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ntemporary gay men’s intimac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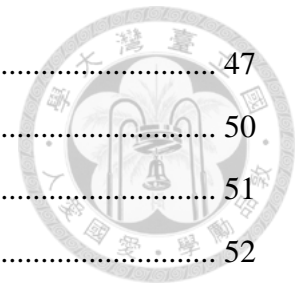
Keywords: gay men, precarious work, precarity, intimacy, open relationship, relational work, economic power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一、前言	1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提問	2
(一) 同性親密關係：純粹關係還是經濟攸關？	3
(二) 貧窮同志親密關係：消費與階級化的互動關係	5
(三) 危殆工作、危殆性與同志親密關係	7
(四) 關係工作、權力與金錢的道德力量	10
三、研究方法	12
(一) 田野地介紹	12
(二) 田野進入過程與位置性	13
四、章節安排	16
第二章 年輕男同志的危殆工作與調適策略	18
一、環環相扣：貧困家庭、教育軌跡與求職路徑	19
二、危殆工作調適策略：兼併工作與出讓穩定時間	21
三、不穩定未來：男男間性相關產業	24
四、小結	29
第三章 圈內社交的金錢課題：性感階序、情愛消費與尊嚴	32
一、先於性感階序的經濟篩選機制	33
二、尊嚴之爭：情愛消費的雙面效應	37
(一) 同時維繫內外感情：情愛消費與關係命名	38
(二) 有情人難成眷屬：情愛消費的尊嚴危機	40
三、小結	43
第四章 協商圈內交往形式：勞動、性愛與經濟權力	45
一、對等協商的關係工作	46

(一) 協商從事男男性相關產業	47
(二) 協商進入性愛開放式關係	50
二、不對等協商的關係工作	51
(一) 陽剛消費與經濟依賴	52
(二) 無法拒絕的開放式協商	53
(三) 無法主動協商關係範疇	56
三、小結	58
第五章 結論	59
參考文獻	63



表目錄

表 1 報導人基本資料簡述.....15



第一章 緒論



一、前言


小翔與光光在錢這件事上鬥嘴，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在我做田野的日子裡，這對男同志情侶經常為了周轉不靈而爭吵、為了對方花錢娛樂的方式而吵、也會為了排班太累想請假而吵。話雖如此，他們依然交往了六年，相互扶持著，一起度過許多經濟難關。不過就在田野將要收尾時，有回小翔拉著我和阿田——情侶檔共同的異性戀女性朋友，經常擔任兩人的和事佬——例行性地抱怨光光。不同於往常那帶著點甜蜜的碎念，這天小翔的語氣平穩而沈重，彷彿預示著這段感情即將步入尾聲：

小翔：我真的會想要結婚，但結婚我就想要找一個比較穩重的對象……就算現在沒錢，但可能以後會有自己的房子、車子，然後分期付款兩個人一起負擔，有共同的目標那就好好存錢、好好規劃人生。可是光光沒有，照他目前生活的狀態，感覺不出他有什麼規劃……跟他結婚我會馬上負債十萬吧！

(2022.10.20，小翔預告分手田野筆記，頁16)

不出一個月，小翔便主動向光光提出分手，結束了這段長達六年的感情。對於小翔而言，兩人的感情固然珍貴，可經濟上的現實卻不斷提醒著他：結婚是重要的人生目標，但是以光光現在的經濟條件以及用錢方式，可以預見兩人之後會吃上不少苦頭；那麼不如就將關係終止，尋找其他可能。

在感情裡考量經濟上的現實，並因此嘗試改變關係，甚至是終結親密關係，類似的情節不斷地出現在田野現場。對這群年輕的男同志來說，他們同樣期待擁有一段長期穩定的親密關係，不過他們找尋對象與經營感情的過程，卻經常受到金錢活動——借貸、消費、求職等等——所影響，形成許多待克服的難題。倘若忽略了這些金錢花用的日常瑣事，我們可能會誤將男同志視為同質的整體，並僅透過性／別以及性傾向的視角來探察他們的生命經驗；然而這樣的視角，恐怕已在酷兒研究學界行之有年。



2020 年，紐約市立大學英語系教授 Matt Brim 出版《貧窮酷兒研究》（*Poor Queer Studies*，暫譯）一書，甫上市便收穫大量關注。Brim 指出，過去三十年以來酷兒理論逐漸在學院內紮穩根基，成立了以之為名的專業系所，並且發展出自己的理論系譜。不過由於酷兒理論的生產者大多位於北美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或許出於求學經驗、或許出於日常遭逢的菁英人際網絡，酷兒理論家們不免忽略了貧者具體的生命紋理；它們雖然經常在未來研究議程提及諸多應該關注的交織類屬——性別、性、種族、階級、身心能力等等——然而階級，卻經常在實際的分析當中缺席。

台灣的酷兒研究學界，似乎也出現上述的階級偏誤。酷兒思潮翻譯入台近十年以來，趙彥寧（2000）觀察到台灣相關的研究者／引進者不僅大多為碩士生，它們也多身處在台灣的「前段大學」當中，其產製的研究不免常帶有階級方面的潔淨化傾向。時隔二十年，酷兒學者們依舊不斷重申，在新自由主義漸興、個人主義個體愈發成為常態的當下，酷兒研究者們更應該擴大陣營，廣納階級意義下的「失敗者」進入研究當中（Wen, 2020；陳佩甄，2020；紀大偉，2021），觀察「活不起、生不起、性不起、病不起、住不起、老不起」¹的危殆同志群體。

受到上述酷兒研究者所啟發，以及在田野中不斷遭逢類似的現象，我好奇相較於過往研究頗豐的中產階級男同志的情感經驗，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們如何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此過程又如何受他們的階級出身、日常金錢運用，以及他們從事的危殆工作所影響呢？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提問

為了回答初始提問「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如何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首先本節爬梳過往對於同性親密關係的討論，指出同性親密關係並不盡然是「純粹關係」，其中反倒充滿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些關係中的經濟活動也多鑲嵌於圈內的性／別角色意識形態當中；其次，從過往兩種研究貧窮同志親密關係的取徑出

¹ 此處的「六不起宣言」，借用自「貧窮同志參政團」於 2013 年舉辦的「上不了桌！貧窮同志的不合格成家論壇」宣傳標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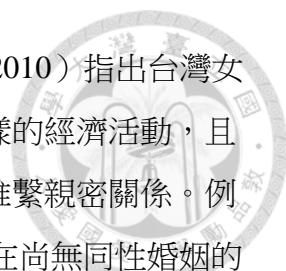
發，本研究將關注圈內社交的階級排除機制，以及親密關係內階級化的互動；第三款則引入「危殆工作」與「危殆性」的概念，進一步定位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最後，透過具備權力觀點的關係工作視角，我將建立本文的分析框架，並提出更詳細的研究提問。

（一）同性親密關係：純粹關係還是經濟攸關？

Giddens (2001[1992]: Ch8) 在討論當代親密關係的轉型時，曾將同性間的親密關係視為是「純粹關係 (pure relationship)」的典型與先驅。後繼研究者對此宣稱有諸多修正，包含質疑純粹關係是否為當代親密關係最重要的內涵，並挑戰同性親密關係是否真的近似於純粹關係。

就 Giddens (2001[1992]: 61) 的定義而言，純粹關係指的是：「當個人不為任何外在原因，只為了藉著和他人之間某種持續的關係而獲益，而且只有在雙方都覺得這個關係帶來足夠的滿足時才維繫這個關係。」他認為同志們由於缺少生養孩子的機會與義務，加以伴侶雙方社會性別相同，較能逸脫於異性戀二元性別角色的束縛，因此相較異性戀，同志們更早就開始實踐這種較無固定腳本且基於相互協商的親密關係。他同時指出同性親密關係的特徵是「經濟上的不平等沒有像大多數異性戀關係那麼明顯；雙方分擔家事多少仍是不變的原則 (143)。」

不過 Jamieson (2002[1998]) 對上述宣稱有所保留。她一方面將純粹關係定調為「揭露式的親密關係」，並指出當代的親密關係——無論異性戀或是同性戀——仍然需要依靠物質性的關愛、照顧與分享來維繫，經濟安全、物質享受和揭露特許知識，都是在構成親密關係時同等重要的元素 (10-12; 196)；另一方面，她也列舉諸多同志親密關係研究，指出事業心以及勞動收入影響了同性親密關係當中的權力位階，甚至影響關係存續與否 (182)。也就是說，同性親密關係並不僅只依靠雙方在心理上的親密與滿足來維繫——也就是 Giddens 所謂的純粹關係——物質條件仍舊重要，且關係參與者的勞動狀況與經濟條件也可能會滲透進關係的權力階序當中，影響關係的日常運作。



與 Jamieson 的批判觀點類似，李慈穎（2007）與趙彥寧（2010）指出台灣女同志親密關係的運作方式並不近似純粹關係，其中反倒充滿多樣的經濟活動，且參與者需要就此進行大量協商，透過恰當的經濟活動才有辦法維繫親密關係。例如李慈穎（2007: Ch5）指出，透過「家務勞動」，女同志得以在尚無同性婚姻的社會情境之下編織家庭實體，亦即透過充滿情感的共同經濟活動——做家事、採買日用品、規劃家庭空間——來鞏固雙方的日常生活連帶，進而維繫關係。這說明除了心理上的歸屬感，經濟活動對於維繫女同志親密關係同等重要。趙彥寧（2010）則透過兩個世代的女同志比較研究指出，年輕世代的女同志（即 1990 年代「出道」者）在成長過程中養成的消費慣習，使她們逐漸援引金錢互換邏輯來評量親密關係的倫理實作，也就是雙方考量彼此的付出（情感投入、金錢與禮物的收受）是否對等與公平，據此評估該維繫或解散親密關係。以上的研究均顯示：女同志親密關係的維繫，其實有賴於關係參與者恰當地投身共同經濟活動，參與者也會據此來感知以及評估是否該繼續維持既有關係。

至於男同志的親密關係，其中不僅同樣充滿經濟活動，它們更經常是鑲嵌於「圈內性／別角色範疇」當中。例如 Zheng（2018: Ch3）針對中國大連地區男同志的民族誌研究指出，當地的男同志們——如同台灣與香港——也慣用「1 號」與「0 號」來界定其他男同志，這套圈內性／別角色範疇不僅指涉性行為的插入方與被插入方，更援用了異性戀的性別角色意識形態加諸於互動過程。像是 1 號經常扮演異性戀男性的角色，提供 0 號生活經濟支持；0 號則常如異性戀女性一般，接受照料的同時讓渡部分權力，居於關係中的從屬地位。蔡孟哲（2009）關於台灣男同志性／別角色分類的研究則同樣顯示，在台灣的男同志圈內，界定一位好「哥哥（1 號）」的標準，通常是看其是否擁有在經濟上與情緒上照料「弟弟（0 號）」的能力。

透過以上爬梳，我們可以初步推論：相較於純粹關係所勾勒的樣貌——關係參與者依靠對彼此的親密理解，跳脫出既有社會經濟結構的約束和關係義務來締結親密關係——事實上，男同志的親密關係當中存有大量的共同經濟活動，其不僅對於關係存續影響重大，且經常扣合於圈內性／別角色範疇。不過在以上的討論中，多數作者尚未將個人的經濟條件限制，或是底層的危殆工作納入分析。也

就是說，我們尚不理解對於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而言，倘若在親密關係中難以「恰當地」參與經濟活動，將會對其個人以及關係存續造成什麼影響；經濟條件與勞動狀況對親密關係的影響力仍屬未知。在下一款當中，透過引入具備階級與貧窮觀點的同志親密關係研究，我將指出在研究「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如何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時應該觀察的重點。

（二）貧窮同志親密關係：消費與階級化的互動關係

目前關注貧窮同志如何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大主軸，二者皆是本研究重要的參照對象。第一批文獻關注同志消費空間中的階級納入與排除效應，第二批文獻則關注親密關係當中階級化的互動關係及其後果，包含跨階級互動以及同階級互動。

第一批研究貧窮同志親密關係的文獻，即關注同志消費空間中的階級納入與排除效應，源自 David Evans 在 1990 年代試圖將「消費的政治性」連結至「同志性公民權」的嘗試，以及後續論者對「粉紅經濟（Pink Economy）」²現象的批判。Evans（1993）指出同志群體經常被夾在兩股社會力量之間：一端是消費市場賦予個人的自由，另一端是社會上持續存在的同志污名。他認為倘若能透過消費證明自己也是一位具有消費力的合格公民，不失為正當化同性戀認同的一種戰鬥策略。不過後續論者指出此策略的盲點：不具備此等消費能力者，例如青年、女性、新移民或是勞工階級的同志，恐將被排除於同志認同社群之外（轉引自江紹祺，2018: Ch3）。

延續前述質疑，不少關注階級差異以及貧窮現象的同志研究者著手分析同志消費空間中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及消費秀異（distinction）等現象，理論觀點則多援引及調整 Bourdieu（1984）所建立的場域—慣習—資本理論體系。相關研究例如英國勞工階級女同志在同志酒吧面臨的排除與不安全感（Taylor, 2007: Ch6）、香港男同志在同志酒吧與桑拿面臨的階級與年齡歧視（Yu, Ting

² 指（有錢的）同志群體以消費能力正當化自身的公民資格後，大型企業反過來將同志群體設定為利基市場來營利的現象。

Fai, 2017；江紹祺，2018），以及中國男同志內部新興的五種階級分化形式³：雖然不同階級者出入不同的同志空間、透過消費彰顯各自的社會地位，但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排斥位於階級最底層的「Money Boy」（Zheng, 2015: Ch4）。上述研究提示了消費對同志之重要性的雙重視角，構成本研究的觀察重點之一：消費是個人對外彰顯性認同的策略之一，是創造出同志社交時空的方式；但消費同時可能是同志彼此競逐的秀異手法，甚至成為排除貧窮同志參與圈內互動的機制，限制他們創建親密關係的機會。因此，本研究將觀察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如何受制於圈內社交的階級排除機制，同時觀察他們透過什麼策略來突破障礙、參與圈內社群互動。

第二批文獻則關注同志親密關係中階級化的互動關係及其後果，包含跨階級互動以及同階級互動。就跨階級互動而言，持樂觀看法者如 Stacey（2019[2011]: Ch1），她指出對於美國洛杉磯地區的男同志來說，由於當地盛行在實體空間中「釣人（cruising）」的隨機性愛活動，低階級的男同志有機會在過程中結識高階級的男同志，甚至就此開展出長期親密關係，間接促成階級流動。她將此現象概念化為「同志上配（gay hypergamy）」：年輕的男同志以年輕美貌，向年齡較長的男同志交換穩定關係以及經濟保障⁴。同樣對於跨階級互動持樂觀看法者如林純德（2016），他指出台灣的客家男同志有可能反轉交織著階級與族群的污名，將羞恥感轉化為自我認同的資源；即便跨越社會類屬（勞工／中產、鄉村／都會、客家／閩南）的互動可能充滿挫折，但客家酷兒主體能夠以這些經驗創造認同，並可能體會敢曝（camp）的樂趣。

不過也有學者對同志親密關係中的跨階級互動並不如此樂觀。像是 Taylor（2007: Ch7）針對英國勞工階級女同志的研究指出，中產階級的女同志經常認為勞工階級女同志是較無知且政治冷漠的，也會避免與後者約會，因為她們認為這樣形同浪擲自己的光陰與資源（173, 176-177）；勞工階級女同志則經常因為難以

³ 分別是位居最高階層的紅領（黨職與公職）與金領（年收入高於四十萬人民幣、受高等教育者）、中間的白領（心智勞動者）、藍領（體力勞動者）與灰領（大學生，可能成為白領或藍領），以及在階級底層的「Money Boy」（男男性工作者，通常出身自農村）。

⁴ 類似的現象也可能已在台灣出現。Lin, Z., Yu, W. H., & Su, K. H.（2019）針對台灣同性與異性伴侶的統計研究指出，同性伴侶相較於異性伴侶有更異質的原生家庭社經地位，這代表台灣也可能存在不少「同志上配」現象。不過其原因是否為 Stacey 所描繪的隨機性愛活動，仍有待考察。

共同支應日常消費而感到在經濟上被迫依賴對方，既不安全也不自在。此外，她們也經常被中產階級女同志相對「揮霍」的消費實作給激怒，導致跨階級的親密關係衝突不斷，相對不穩定（172, 176-178）。




至於同為勞工階級的女同志之間的親密關係，也經常存在矛盾的、驕傲與羞恥並存的情感。一方面，共享勞工階級的生命經驗、擁有類似的階級文化，使得雙方毋須多言便容易相互理解；另一方面，雖然同為勞工階級，但仍可能因教育程度而劃下界線：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工階級女同志常會抱怨低教育程度的伴侶，認為她們的生活細節不體面（decent），也難以與之開啟有深度且恰當（proper）的對談。且若對方的經濟狀況不穩定，更會對關係存續造成負面影響（Taylor, 2007: 170-171, 174-175）。

根據上述第二批文獻，同志的跨階級親密關係是否更容易解散，似乎仍未有定論。一方面，較為年輕但經濟窘迫的男同志，有可能透過年輕美貌向年長男同志「交換」穩定關係與經濟保障，建立起跨階級的親密關係；另一方面，關係中階級化的互動，可能令經濟窘迫的男同志在跨階級關係中感到不自在，甚至是尊嚴受損，使得跨階級親密關係變得脆弱危殆。因此，除了第一批文獻提及的消費實作以外，本研究也將聚焦於親密關係中階級化的互動，包含雙方如何感知與評價對方的階級屬性和經濟實作，以及此評價對於個人和親密關係的影響。

（三）危殆工作、危殆性與同志親密關係

在前述具啟發性的貧窮同志親密關係研究當中，我認為有兩點是本研究的田野資料可以進一步提出貢獻的。第一，在這些研究當中，勞動多被看作是個人經濟窘迫的原因，且被獨立於親密關係外進行階級再生產式的分析。換句話說，勞動與親密關係的連結是間接而非直接地，作者們是以貧困的經濟條件，而非將勞動本身構連至親密關係做分析。不過就田野資料而言，我發現報導人從事的危殆工作，其工作內容與時間安排皆影響著他們經營親密關係的過程，我認為勞動本身應整合進分析當中。第二，在上述研究中，親密關係常被預設為封閉式關係⁵，

⁵ 或稱一對一關係，指具備性忠貞與情感忠貞義務的關係。不具備性或情感忠貞義務其一或其二



關係的「形式」如何可能受到經濟條件與勞動狀態影響，仍屬未知。例如 Taylor (2007: 157) 雖然指出勞工階級女同志報導人當中包含長期單身者、正在尋找伴侶者、封閉式關係者以及非單偶關係者 (non-monogamous)，不過在分析中所呈現的主要仍是封閉式關係。我們不清楚經濟窘迫的男同志在考量經濟條件與勞動狀況的現實之下，如何透過重組親密關係中的各項元素——如親密情緒、性愛活動、金錢交流——以持續維繫關係，也未見開放式關係的相關討論，儘管開放式關係在同志親密關係當中其實並不少見 (Adam, 2006; Heaphy et al., 2004; Weeks et al., 2001)。在本款中，我將先回應第一點批評，從「工作、同志身份與親密」的既有討論出發，引入危殆工作 (precarious work) 和危殆性 (precarity) 等概念，凸顯當代年輕男同志的特殊性；第二點針對親密關係形式的討論則留至下一款。

在 D'Emilio (1983) 開創性的研究中，我們理解北美同性戀身份興起與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進展密切相關；史國良 (2001) 延續此論證，透過對比中國與台灣自二十世紀起的資本主義發展差異，同樣指出薪資勞動對於發展同性戀認同與親密實作的重要性。歷史學家 D'Emilio (1983) 指出，薪資勞動隨著資本主義同步擴張，使得北美的男男女女有機會降低與原生家庭在生計上的互賴，透過販售自身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同時隻身移居至都市當中。這些有著同性慾望的男女在地理空間上聚集、在身份上同樣被精神醫學病理化，伴隨著性愛脫離生殖成為享受的社會氛圍，創造大量的同志性愛互動時空，並逐漸催生北美二十世紀中葉的同性戀身份認同。

將鏡頭帶回東亞。人類學家史國良 (2001) 在 1993 年至 1996 年於中國浙江與台灣高雄進行田野調查，他發現兩地的資本主義進展與土地持有制度不同，導致擁有同性慾望者的身份認同產生差異。由於台灣的土地已可自由買賣，加以薪資勞動興盛，擁有同性慾望者 (尤其男性) 較易脫離原生家庭在居所與生計上的

的關係則稱為開放式關係 (open relationship) 或非單偶制關係 (non-monogamous relationship)。又，前述貧窮同志親密研究中少數的例外，是 Stacey (2019[2011]: Ch1) 對於男同志多樣化的關係形式的討論，不過她尚未將關係形式轉變的動力扣連至經濟活動與個人的社經條件，而是視為男同志因為被排除於異性戀婚家想像之外，經由努力探索、重組關係中的元素與規範來建立 (開放式) 關係的結果 (p.95)。

互賴束縛，聚居都市並發展出同性戀身份認同，許多同性戀會在異性婚姻之外過上雙重生活。以上研究均顯示當代的薪資勞動體制對於同志形成認同、彼此相遇以及發展親密實作的關鍵地位。不過由於上述研究調查的年代段較早，其工作類型尚未觸及晚近因為新自由主義而大量增生的危殆工作（precarious work）以及伴之而生的日常生活的危殆性（precarity），因而難以掌握危殆工作對於同志親密關係造成的衝擊。

所謂危殆工作是「從工人的觀點看來不確定、不可預測以及充滿風險〔的工作類型〕」（Kalleberg, 2009: 2），具體來說包含臨時工、部分工時工、定期契約工、勞動派遣以及承攬外包等等。這些類型的工作起因於資方試圖在二十世紀末資本全球化的情境下增加競爭力，透過提升僱傭彈性來壓低成本，使得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體制中部分工作變得愈發不穩定（Kalleberg, 2009: 15），而這些不穩定的工作——即危殆工作，或稱非典型工作（nonstandard work）——多半由較年輕且持有相對較低的文憑與技術者所操持。台灣既有研究也已指出，曾從事危殆工作者有更高機率繼續從事同類型工作（柯志哲、張珮青，2014），其中臨時工與勞動派遣者的時薪與總月薪均是最低的，可謂典型的工作貧窮群體（working poor）：他們即便擁有一份固定工作，其家戶總收入仍低於貧窮線（林宗弘，2009: Ch3）。

上述的危殆工作不僅降低了個人的總收入，也攪擾了穩定的生活節奏和對未來進行規劃的意願與條件。如人類學家 Kasmir（2018）所言，近年來出現不少民族誌試圖紀錄社會上的邊緣群體，例如移民、難民、無家者及危殆工作者，他們共享著日常生活的危殆性（precarity），亦即他們的生活不見得會有目的論式的進步、一個人活著僅只是為了活著，其生活常被寂寞與孤立感所充斥。生活籠罩在危殆性之中，對於年輕且操持著危殆工作的男同志來說會造成什麼影響？不穩定的時間安排以及受限的經濟條件，對他們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又會形成什麼挑戰？我發現報導人們並非全然棄絕或被排除在親密領域之外；反之，他們正嘗試以改變親密關係「形式」的方式來回應上述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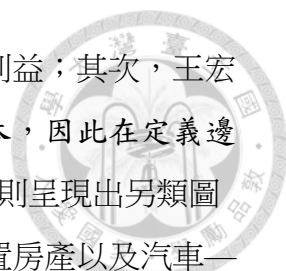
（四）關係工作、權力與金錢的道德力量

為了分析親密關係形式如何受協商改變，本研究援用 Zelizer（2009[2005]）所提出的「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取徑，分析報導人們在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時，考量危殆工作與經濟條件的限制之下，如何協商性愛、情感、勞動以及金錢使用，觀察此協商如何影響親密關係的存續及其形式。Zelizer（2012: 146）將關係工作定義為：

對於每個特定範疇的社會關係，人們會建立邊界（boundary），透過命名與實作來標誌出邊界，建立一組對於邊界內應如何運行的獨特理解，視特定的經濟交換（transactions）對於關係是恰當的、阻卻不恰當的交易，並採用特定媒介（media）來計算及促進關係中的經濟交換。此過程即關係工作。

Zelizer（2009[2005]）提倡的關係工作視角，一方面拒絕互斥論（hostile worlds）的觀點，即視經濟活動與親密關係為兩個獨立的領域，且相互混淆會導致不效率或是不道德（13）；另一方面也拒絕除此而無他（nothing-but）的化約論觀點，亦即關係中的經濟活動，只是服膺於文化腳本、經濟理性或是政治權力三者其一的一種現象（19）。反之，她主張人們生活在連接領域（connected lives）之中：人們參與在各式相連且具有清晰邊界的社會關係，關係內不可避免地包含多種經濟活動，因而參與者需要不斷進行關係工作來區辨（可能被歸類的各種）關係，即透過交換適當的媒介來創造、確認、變更或是終結關係（22）。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媒介（media）並不限於法定貨幣或是具有經濟價值的象徵物（例如食物券或鑽戒），也包含了各式勞務，像是性行為本身也可能成為親密關係中一項用以協商的媒介，參與者可以透過即時給予、延後或是不給予性愛體驗，藉以將關係範疇導引至自己預期的方向。

在台灣既有的同志親密關係研究中，王宏仁（2021）便曾以此取徑研究同志家族企業中的親密關係與經濟活動，他提出兩點主張：首先，關係工作除了可能用以確認或修復既有關係，也可能是關係參與者解決「個人」問題的方式。在本研究當中，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面臨經濟條件的限制與生存的考量，也會動用



關係工作來解決「個人」所面臨的難題，保全關係並獲得個人利益；其次，王宏仁指出「同志的親密關係卻沒有〔如異性戀般〕清楚的社會腳本，因此在定義邊界時，就無法那麼社會性地定義清楚。」（115）本研究的資料則呈現出另類圖像：年輕的男同志援引異性戀婚姻的經濟想像——例如共同購置房產以及汽車——來構思親密關係的未來，以之評估此刻交往對象的經濟能力，並據此決定是否持續維繫交往關係。換言之，他們正在吸納既有的（異性戀）社會腳本，據以經營親密關係，關係之間相連的邊界也可能因此而逐漸鞏固並更為清晰。

在王宏仁（2021: 115）的研究當中，他指出尚未論及同志親密關係裡的權力議題，本研究也將進一步討論此課題。如同 Bandelj（2012: 180）所提醒：「權力是關係工作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即便不是透過直接的物理力量，透過幽微的語言表達，也能側面理解關係工作參與者間不對稱的關係。」奠基於此，本研究將關係工作區分為「對等協商」與「不對等協商」兩種樣態，透過關係參與者彼此之間的權力高低是否存在明顯落差來區分。至於如何分析權力，我採納 Wilkis（2018: 13）提出的「金錢的道德力量（moral power of money）」觀點，亦即行動者傾向對金錢的來源與使用的方式進行區分和評價，若其在特定關係中具備正當性，則能累積個人的道德資本（moral capital），使人在社會關係中的權力階序上升，有辦法更順利地進行關係工作；反之，位於權力低點者，則可能難以主動開啟協商，或是無力拒絕對方的要求。

奠基於以上文獻評述，本研究將初始提問「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如何建立與經營親密關係？」拆分為以下兩組子提問：第一，建立親密關係時，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如何受制於圈內社交的階級排除機制？他們又如何突破障礙，參與圈內社交？第二，經營親密關係時，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考量經濟條件限制與危殆工作狀態後，如何對等或不對等地協商性愛、情感、勞動以及金錢花用？這又可能對關係形式產生什麼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透過訪談和田野參與觀察來理解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如何建立與經營同性親密關係。為了結識適合的報導人，我選擇位於台北市古亭區的一間同志性健康文化推廣機構「彩虹基地」⁶作為田野地，於 2020 年 9 月成為志工，在徵得社工主任同意後開始進行研究，並在 2021 年 2 月徵得七位主要報導人後，轉以參與報導人的私人聚會以及訪談為主，減少參與彩虹基地的活動。以下將介紹田野地彩虹基地，說明進入田野的過程與位置性，並簡介七位主要報導人。

(一) 田野地介紹

田野地「彩虹基地」由台灣某醫學會出資成立，距今已營運約三十年，包含四位正職人員以及一位研究助理，皆為三十至四十歲左右的男同志。基地的工作目標是建立同志友善的健康服務環境，促進同志身心健康以及預防性相關疾病，每年向衛福部疾管署申請補助並上報愛滋匿名篩檢業績，也與其他同類型組織有密切的往來及潛在競爭關係。

基地的日常業務包含三個部分：首先，工作人員及志工於基地內或是同志消費空間擺攤進行愛滋匿名篩檢；其次，工作人員舉辦免費的同志聯誼活動，像是免費聚餐、電影欣賞、瑜珈課程、議題講座或是狼人殺大賽，藉以凝聚並追蹤過往曾參加過匿名篩檢的男同志⁷；最後則是共同舉辦年度的大型愛滋防治宣導活動，此時會動用大量的志工參與協助。值得注意的是，彩虹基地設有「急難救助金」，提供經濟危難的志工申請使用，是當初吸引我前來研究的原因之一。不過從開始研究至今，尚未聽聞有志工申請過此筆經費，經詢問工作人員後，他們也表示這幾年皆無人申請。

⁶ 本文中提及的所有組織與人名均為化名。

⁷ 每次參與上述聯誼活動的人數約在七至十人，全為男同志，大多為過往曾來基地做過愛滋匿名篩檢者，他們經由基地的社工招募為「志工」後加入 Line 群組，該群組經常邀請志工回來參與免費活動以及常態無薪排班。對基地而言，志工的存在至少有三種目的：第一，持續追蹤參與者的性健康狀況，並透過持續匿名篩檢來達成疾管署補助後設定的篩檢量；第二，以志工為基礎來向「同志圈」傳散性健康資訊；第三，透過志工來招募潛在的受訪者或是受試者，例如有次社工主任發訊請志工們協助介紹正在從事男男性相關工作者，作為他們新補助計畫的受訪者。



(二) 田野進入過程與位置性

2020年9月，參加完為期兩天的培訓與演講後，我成為基地志工群的一員，並開始排班做無薪常態勞務（折宣傳單、鍵入篩檢資料、接聽來電並轉接）及參與前述免費活動，一週參加一至兩次，每次約為四個小時，於過程中結識其他志工，並邀請符合以下資格者成為報導人：自我認同為男同志、原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以下、現在職業為非典型工作或收入低於等於基本工資者，年齡則不設限，這在後方會說明。在結識了四位報導人後，我請他們轉介身邊具有類同背景者，總共結識七位主要報導人，其基本資料簡述請見後方表1。

2021年2月起，我減少在基地的排班量，轉為大量參與報導人個人或彼此間的私人聚會（共35場，包含吃飯、慶生、探班、散步、夜晚通話、跨年聚會等等，過程中也結識其異性戀友人）以及邀約訪談（共計16場訪談，包含單獨訪談及情侶共同訪談，多介於1.5至2個小時，少數訪談時長至3個小時）。以上的田野筆記以及訪談由我轉寫為逐字稿，透過反覆閱讀進行編碼，抽取出數個重要主題並以之建立分析架構。

在彩虹基地結識時，最初我會向報導人及其朋友主動說明自己的研究生身份與研究主題，並在確認他們符合研究資格後提出訪談邀約，這大概都在前三次會面之內進行。不過許多人在聽完後並不非常理解研究生與訪談所指為何，我便以「好奇且想紀錄你們的生命故事」為由，以訪談作為初次深入聊天的契機，並在事後交換聯絡資料，繼續留在報導人身邊，固定一段時間便逐一邀約他們出來吃飯聊天散步，討論生活、感情以及工作近況等，並抓住時機追問過往發生的事。少數的人（例如光光）後來將我視為一位潛在可發展情慾的男同志友人，在言談互動之間持續提出性邀約，這或許肇因於我跟他的圈內性愛角色恰好互補，其他同為0號的報導人則不曾如此想過。不過由於本研究並不打算觀察性行為本身⁸，涉及性愛的部分則是關注其作為協商親密關係的一項媒介，這可透過訪談追憶和

⁸ 過往研究者如吳文煜（2003: 14）就曾以參與性愛活動為田野研究方法，因為其關注焦點包含高雄愛河畔的野外性愛社群互動規則、性愛參與者彼此間的互動以及區異等，他指出以此為方法較能融入社群當中並獲得細緻的分析資料。

參與日常口語互動搜集資料，因此我曾委婉地拒絕性邀約，或是透過第三人（他的前男友小翔）向其表示我無意約砲，將研究關係限縮於「（無性愛可能的）同志友人」範疇，避免潛在的紛爭。



除了被視為潛在可發展情慾的男同志友人，也有人將我的到來看作是多了一位可談心的圈內朋友，且是聊天主題與其他只注重外貌且「膚淺」的男同志不同的人，像是報導人小芳及他的學弟小藍。可能也因此，他們倆經常向我剖析男同志的「圈內生態」有多麼殘酷或無趣，有時也會傳來性／別議題的新聞，與我抒發他們的意見。

本研究雖說結合了訪談與田野參與觀察，不過在經歷過兩三次訪談後，仍有兩位報導人並未與我發展出較為親近友好的私人關係（例如阿淳與飛飛），並視我為一位喜愛聽取故事的「奇特的人」，雖然仍無私地向我講述了大量的私人經驗，不過並不會在訪談以外的情境下見面（像是其他報導人會與我共同吃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透過瀏覽他們的社群網站貼文（臉書與 IG 的公開貼文）來理解他們最近的生活動向，或是觀看他們與其他人的留言互動，來為他們講過的生命故事做初步的三角檢驗。舉例來說，阿淳曾在臉書上紀錄他過往的無家經驗與後來遇見男友的過程，其時間軸與細節均與他訪談時所述無異，其他網友們的留言討論也讓事件帶出了更多細節。

最後，本研究在尚未進行田野工作前並無設定報導人的年齡限制，僅聚焦於經濟困窘與參與危殆工作這兩項特性。在來到彩虹基地以前，2020 年的暑假我也曾在深夜出沒於二二八公園、到無家者的休息據點，或是在同志手機交友軟體上零星地尋找報導人，不過效果均不理想。田野的突破，是一次偶然看見彩虹基地的愛滋匿篩廣告，前往匿篩後，社工師在閒聊時向我提起此處有志工培訓與急難救助金，在初次志工培訓的自我介紹環節聽聞眾人的工作，才發現並鎖定幾位初始主要報導人，他們恰好年齡與我相當接近，都是二十出頭歲，由他們滾雪球介紹的對象年齡也差不多，遂讓這份研究漸漸聚焦於「年輕」的男同志身上。可以說，身為二十出頭歲的男同志研究生這個位置性，影響了我在田野中的遭遇，也讓主題漸漸聚焦於類同年齡者身上。

表 1 報導人基本資料簡述

化名	年齡	圈內性角色與性別氣質	現職與月收入	教育背景	住居地與房租	原生家庭經濟狀況	感情狀態
光光	23	1 號，宣稱自己從不被插入，因為怕痛；面對伴侶則愛撒嬌、國中時也曾被笑過娘。	餐廳外場服務 23800	科大畢業	三重家中 房租 0	有一位妹妹，母在超市當推銷員、父任職工廠作業員，國中起開始打工自付學費，持續至科大畢業。	曾與小翔交往已分手
阿力	23 歿	不分，性角色隨對方改變。國中至大學均曾經歷校內恐同事件，讓他對自身的娘有所警惕。	飲料店員 23800	科大肄業	景美雅房 房租 5300	獨生子，父歿，母從事飯店房務、超商收銀，或與男友做貼磁工人。父母仍有卡債待還，姑姑外婆偶會資助他們。	單身
小翔	27	0 號，曾因很愛一位 0 號砲友乾哥而為他轉 1，但僅只這位。喜愛被「哥哥」照顧的感覺。	雷射雕刻工人 30000	科大畢業	永和雅房 房租 6000	獨生子，父母為身心障礙者，合開彩券行，光光也曾無酬在此工作過一個暑假。	曾與光光交往現交往中
小藍	28	不分，認為無需強調 1 與 0 的性別氣質之分，角色隨對方而改變。	接案攝影剪輯 20000	藝大碩畢	西門套房 房租 9000	獨生子，母退休，父已組建新家庭，仍會匯生活費給母；希望自力更生，不和母拿生活費。	單身
小芳	29	0 號，以身為 0 號驕傲，在軟體上標註「拒拒 C ⁹ 」，樂於展現娘氣質來「做自己」。	壽險業助理 23800	科大畢業	文山家中 房租 0	獨生子，母任職麵包店員、父為保險業務員，現職為父協助安插。幾年前因債務將家中房屋賣出，全家共同租屋。	單身
阿淳	32	0 號，此為他根據自身性別氣質所推	工程師 60000 ¹⁰	博士在讀	鶯歌套房 房租	有一位姊姊，父歿，母持續無家者狀態，已與	交往中

⁹ 所謂「拒 C」是「拒絕 Sissy (娘娘腔)」的簡語，小芳以「拒拒 C」來反擊這種男同志崇尚陽剛且賤斥陰柔的文化，並試圖吸引與他有類同想法的男同志。關於台灣男同志的「C/娘指涉」與「恐娘」現況，請參考林純德 (2013)。

¹⁰ 阿淳是這份研究當中唯一歷經「穩固」階級流動者。在結識現任男友後，經由對方的資助及提供住處，阿淳得以離開無家狀態，重返校園乃至因此覓得高薪的工程師工作。對於阿淳，我主要採納他回溯過往無家時期的訪談資料。另，飛飛雖然目前平均月收入可達七萬元，不過他正打算中止網黃及調教師的工作，轉為從事其他較低薪的非典型工作，因此相較於阿淳 (歷經較為「穩固」的階級流動)，飛飛未來的經濟狀況還很難預料。飛飛的職涯選擇請參見第二章第三節。

		測，因他從沒進行過「10」性行為。			10000	之斷絕往來；姊姊脫遊後長居精神療養院中。	
飛飛	33	十八歲初入圈內時當1，二十二歲退伍後多當0，後因第三任男友轉不分偏一；現在則很少「10」，以調教他人居多。	網黃與調教師 ¹¹ 70000	大學畢業	三重套房兼工作室 房租 25000	國中後成為低收入戶家庭；父歿，母常做模板工或服務業零工，大學起常向飛飛討生活費；姊現為服飾店店員，偶也會向飛飛求金援，兄與母共居從事模板工。	已婚 分居 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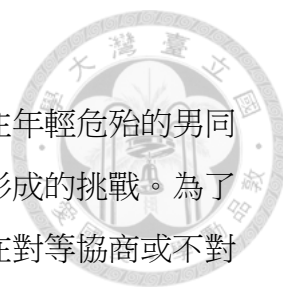
四、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緒論〉說明我的研究關懷以及研究取徑，第二章至第四章為主要的分析，第五章〈結論〉則說明本研究的貢獻和限制。

第二章〈年輕男同志的危殆工作與調適策略〉旨在描繪報導人的經濟處境與勞動狀態，為後續兩章對親密關係的分析做鋪墊。貧困原生家庭導致的教育軌跡與學經歷限制，加上台灣近年服務業「工作貧窮化」的趨勢，使得報導人們經常接連操持低薪且難以升遷的非典型工作。面對此種困境，他們主要發展出三種調適策略，分別是兼併數份工作、出讓工作時間確定性以及參與男男性相關產業。這些勞動調適策略在提升總收入之餘，也逐漸對他們的親密關係產生影響。

第三章〈圈內社交的金錢課題：性感階序、情愛消費與尊嚴〉分析年輕危殆的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試圖建立親密關係的過程，依循現象上出現的時序，從線上結識談至線下長期互動。一方面，我將指出男同志彼此間在追求性感美貌之餘，其實早已對經濟條件設下篩選；另一方面，關係範疇轉換的過程充滿變數，由約砲關係轉換至交往關係時所涉及的「情愛消費」具有雙重解讀可能，有機會拉近關係的緊密程度，卻也可能導致年輕危殆的男同志尊嚴受損。

¹¹ 「網黃」指涉在網路上販賣黃色內容（色情）的「網紅（網路紅人）」，亦即自行拍攝色情影片並在網路上販賣盈利者。關於咖啡的「網黃」與「調教師」職業細節，請參考第二章第三節、第四章第一節。



第四章〈協商圈內交往形式：勞動、性愛與經濟權力〉關注年輕危殆的男同志在經營交往關係時，個人的經濟條件與勞動狀態對關係維繫形成的挑戰。為了提升個人總收入，同時為了維繫既有的親密關係，報導人參與在對等協商或不對等協商當中，透過重組交往關係中的元素，變更親密關係的形式而非範疇，使關係得以維繫下去。章節末尾，我指出年輕男同志正逐漸挪用異性戀式的婚姻經濟腳本來評估親密關係，也預示著經濟權力將對同志親密關係愈發重要。

第二章

年輕男同志的危殆工作與調適策略



2020 年秋天，彩虹基地開啟了新一輪的志工培訓。當時二十三歲的阿力，如同其他許多志工，都曾經來基地進行過免費的愛滋匿名篩檢，經過社工員的詢問而自願加入成為長期志工，立志做一名「圈內愛滋知識的傳遞者」。雖說是知識傳遞者，但志工的日常勞作內容不外乎就是做些簡易的「家庭代工」，像是幫基地員工鍵入資料、對折宣傳紙冊，或是分裝保險套與潤滑液作為匿篩贈品等等。這些小工作做起來並不特別費神，志工們經常三三兩兩地圍坐在一起，邊做事邊閒聊，順道吃著彩虹基地提供的免費點心，有些人也會多帶些麵包走當晚餐。阿力就是在此時向我談起他最近的求職焦慮。

在來到基地當志工以前，阿力在一處預售屋建案當接待員兼保全，經常每天得連續上班十二個小時。雖說薪水確實是比其他工作還要好，但他自覺體力不堪負荷，做了三個月便開始物色新的工作。他最近看上的是銀行信貸客服人員，也正在考慮做網路拍賣的倉儲包貨員，但是兩份工作都只有兩萬五千元的底薪，令他相當猶豫。不過礙於本身的學歷不高，阿力其實也沒有太多選擇，加上他還有學貸及法院判賠的債務¹²纏身，家裡又無力金援他，此刻已容不下時間顧慮——阿力急需一份可以迅速銜接得上的工作。

像阿力這樣的男同志——年輕、工作總收入低、原生家庭不富裕——是這份研究所關注的對象。不同於其他富裕的男同志，報導人們在同志圈內經營情愛生活的過程，在諸多層面受到經濟條件與工作條件所影響。為了理解他們具體的勞動生活型態，以及理解此刻他們為何處在貧窮邊緣，本章將從報導人的原生家庭與教育軌跡談起，連結至他們所面臨的低薪勞動市場現況，最後呈現報導人對危殆工作現況進行的三種調適策略，此策略也將對他們的親密關係產生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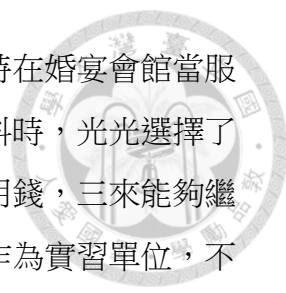
¹² 阿力過去曾販售自己的身分證件與銀行存簿，換取短期經濟補貼，不過這其實是詐騙集團獲取人頭帳戶的手法之一，令阿力捲入詐騙案件，甚至捲入官司。相關研究請參考陳治慶（2014）。

一、環環相扣：貧困家庭、教育軌跡與求職路徑

阿力成年後之所以面臨諸多求職難題，與他的教育軌跡以及工作經歷息息相關，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原生家庭貧窮。自父母離異後，國小的阿力由母親、姑姑及外婆共同扶養，阿力的母親及姑姑們都在擔任模板工人，工作地點遠在市區，離居住的部落有段距離，因此將阿力送至提供住宿與全天照顧的原鄉國小就讀。國高中時，由於原鄉並沒有相應的教育機構，阿力便跟隨母親搬遷至市區租屋，開始讀表演藝術科，他對歌唱的熱情也在此萌芽。在即將抉擇於何處讀大學時，恰好母親交往了新的對象，兩人打算一起搬到台北做貼磁工人。為了就近接受母親的照顧，阿力也從台中共同北上，在台北就讀科技大學的演藝事業系。就讀期間，母親有時會提供他微薄的生活費，不過這些金額遠遠不夠他在學校的日常開支，因此阿力沒課時就會到學校圖書館排班，寒暑假時也都在學校附近的小吃店打工。苦撐了兩年，就在第三年開學前，母親告訴阿力，以她自身的財力狀況，真的難以再供應他繼續讀書；同時，她也希望阿力能投入職場來貼補家用，畢竟單靠母親與「叔叔」做工的薪水養不活兩人。無奈之下，阿力只好申請了休學。

休學後，他仍夢想著在演藝圈做表演工作，便開始在「17 直播」上當唱歌型的直播主，期待可以藉此曝光，並賺取粉絲的贊助金。不過很快他就發現直播圈的生態並不如想像中那樣樂觀：觀眾們不成比例地都是異性戀男性，通常只會贊助女性直播主，對於他這樣總是在直播間閒聊與唱歌的男性直播主一點興趣也沒有。做了一個多月後，阿力便發現這並不可行，過去在演藝系學到的歌唱技巧無法兌現，便重回之前打工過的小吃店上班，開啟了他最近幾年的求職碰壁過程。可以這麼說，由於原生家庭經濟困窘，阿力沒能取得大學學歷，僅具備高職學歷，而演藝相關科系的訓練內容又與他能觸及的服務業勞動市場需求不符，加上過往幾份打工，在履歷或是應用技能上均不具累積性，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使阿力在勞動市場上長期居於弱勢。

受到家庭經濟因素影響教育軌跡的還有報導人光光以及小翔。從國中起，光光就被父母要求要自己賺錢繳交學費，如此一路至大學階段。光光的母親在超市當推銷員、父親在工廠當作業員，兩人的收入僅能勉強打平一家四口的日常開



銷，因此從國二起，身為哥哥的光光每個週末都會花上共八小時在婚宴會館當服務生，這也默默地奠定他對於餐飲業的熟悉與嚮往。在高職選科時，光光選擇了有建教合作的餐飲科，一來能夠降低學費，二來可賺取少許零用錢，三來能夠繼續精進他嚮往的餐飲業技能。高職階段，他同樣選擇婚宴會館作為實習單位，不過讀科技大學時，由於希望可以學習其他技能，光光轉換至旅遊管理系，期待可以進入飯店業，或是能像招生文宣上所講的，有幸到國外的高級酒店實習。不過在挑選實習單位時，由於英語能力並未達標，光光沒能進到飯店裡頭實習，遑論國外的高級酒店。最後，雖然就讀旅遊管理系，不過光光還是回到了熟悉的餐飲業，開始在中式連鎖餐廳當外場人員，而這份外場工作就這樣從學期間延續至畢業後，由實習做至正職，一路做了五年左右。

另一位報導人小翔，在高職階段也主動選擇了有建教合作的流通管理科，因為他理解家裡需要他的這份經濟收入。開學後不久，小翔順利進入物流公司當建教生，開啟了所謂「輪調班」的生活——學期間三個月在校上課，另外三個月在合作單位上班。不過由於家裡開彩券行，父母偶爾會臨時請他請假回來處理必要庶務，在累積了數次臨時請假紀錄後，小翔遭到實習單位「退場」，被迫離開了物流業。可退場後小翔仍然須實習學分才能畢業，他便在同學的引薦之下轉至學校附近的連鎖速食店上班，校方也核准其作為實習單位，只是薪資比起原本的物流工作還少一些，一個月做滿正職的上班時間也只能領到一萬八千元左右的生活津貼。大學階段，小翔打算轉換職涯跑道，因此就讀科技大學的企業管理系，不料企管系的建教合作單位仍然是餐飲業及服務業，他便選擇同一間連鎖速食店作為實習單位，畢業後也「很自然地」以此作為正職，前前後後在同一間連鎖速食店共工作了六年左右。

上述報導人的故事說明了原生家庭經濟貧困對於教育軌跡和求職路徑的潛在影響：第一，經濟貧窮可能導致學業中斷，而缺乏大學學歷將對日後求職造成嚴重的阻礙。如張宜君和林宗弘（2015）所指出的，在台灣 1990 年代經歷第二波高等教育擴張後，中下階級家庭子女也有更多機會進入私立技職大學就讀。因此相較於其他有完成私立技職大學學業者，缺乏大學學歷的阿力將在勞動市場上更顯弱勢；第二，經濟貧窮除了可能導致學業被迫中斷，也會影響個人的教育選

擇：像是光光與小翔，為了立即資助原生家庭、降低教育開銷，他們主動投入高職與科技大學的建教合作計畫以獲得收入。與涂曉蝶（2021: Ch5）對台灣美髮建教合作生的研究類似，光光與小翔並非「誤解」建教生的實質內涵而做此選擇，反而是在國高中時期就已體認到原生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因此主動選擇之。不過此時期的實習工作也默默導引了他們未來的求職路徑——因為已經熟悉相關職場的生活樣貌與工作技能，他們傾向於延續建教合作計畫引薦的低薪餐飲服務業，並就此步入相關次級勞動市場當中。

不過上述的餐飲服務業也並非報導人唯一的職業選擇。畢業以後，大家還曾做過許多不同的行業，例如保全、工廠作業員或是各式基層行政人員等等，這些工作有不少共通點：工作月薪以及時薪均低、勞動時間長且缺乏完整的福利與保障；簡言之，這些工作機會相當高比例屬於次級勞動市場中的非典型工作。過往的研究也已經指出，若曾步入此類職業，彷彿在職涯履歷添上一道「疤痕」，會限制未來謀得高薪工作、進入初級勞動市場的機會（柯志哲、張珮青，2014；何思瑩、柯志哲，2021）。而上述的求職路徑，與報導人的教育歷程環環相扣，更與他們貧困的原生家庭經濟條件有關。報導人們理解自己的勞動處境，也多不甘於僅從事現下的非典型工作，因此他們發展出三種面對危殆工作的調適策略，分別是兼併數份工作、出讓工作時間的穩定性，以及從事男男性相關產業，藉以提升總月收入，試圖擺脫經濟煩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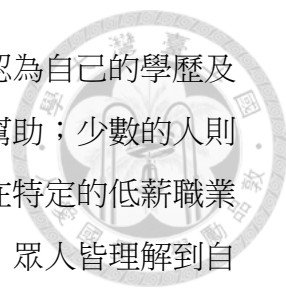
二、危殆工作調適策略：兼併工作與出讓穩定時間

小翔：沒幫助啊！企管系太廣了，你要做服務業可以，你要當高層也可，但首先我要從基層開始往上爬，可能要做到管理方面的才會有幫助，嗎？

（2022.03.02，小翔二訪，頁6）

光光：找工作很簡單啦，因為我飯店餐廳到處走，履歷很漂亮，看我想不想做餐飲業而已……現在就是學我媽，她平日當作業員、假日當推銷員，兩邊是不同種的累，就當作一個新的挑戰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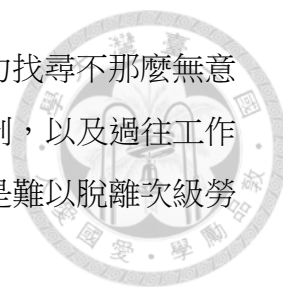
（2022.02.26，光光二訪，頁20）



報導人們對於學歷對求職是否有幫助的態度兩極：多數人認為自己的學歷及過去在學校習得的技能，對日後自己努力找到的工作沒有什麼幫助；少數的人則認為學校所學有助於自己求職，但也隱隱擔憂自己被「定型」在特定的低薪職業領域當中，正努力找尋更廣的工作機會。不過，無論態度如何，眾人皆理解到自己正處在低薪且長工時的勞動條件之中，而未來的求職道路可能也不盡順遂。

在本節當中，我將先描繪報導人面對低薪危殆工作市場的兩種調適策略，分別是兼併數份工作和出讓工作時間穩定性，第三種調適策略則因性質與前兩種策略差異較大，留待下節討論。至於為何報導人會開啟這些調適策略，與他們在勞動過程中的主觀感受和客觀條件有關，這些非典型工作不僅在主觀上難以提供勞動的成就與意義感，客觀上也是相對低薪與無累積性的。認知到此困境，報導人們紛紛展開調適的過程，試圖扭轉現況。

透過阿力的求職歷程，我們可以理解報導人們所從事低薪危殆工作所包含的無意義感，及其如何促使勞動者一再更換工作，卻再次體認到難以改變經濟現狀的困境。如上一節所述，休學之後，阿力回到過去曾打工過的小吃店當服務生。就在工作三個多月時，老闆透露他們其實只想短期聘用學生，無意長期雇用正職員工，柔性地勸說阿力更換工作。此後，阿力接連更換了數份工作，工作維持時間如下所述，它們大多僅提供法定基本工資，少數幾份工作甚至略低於基本工資：便利商店店員，九個月；網路業務行銷專員，兩個月；建案接待員兼保全，三個月；銀行信貸電話客服人員，三個月；手搖飲料店店員，四個月。我曾詢問阿力為何這麼頻繁地更換工作，尤其以他的經濟基礎來說，應該很難承受工作轉換期間的無薪狀態。阿力表示，其中一份網路業務行銷工作，當初是對方在求職網上主動聯繫他，實際工作後才發覺這是詐騙工作——員工們被要求在交友軟體上透過虛假的女性個人資料與照片，騙取異性戀男性的信任與錢財。因此做了兩個月後，阿力就不堪內心的譴責而主動離職。至於其他工作雖然業務內容差異頗大，且都是他主動在求職網站上找到的，但其勞動內容充斥著無聊且成就感低的重複性勞務，工作時又相當要求專注投入，令他苦不堪言。從事這些工作時，唯一讓他稍微感到「還活著、還跟這個世界有一點連結」的片刻，是在上班時偷偷滑手機收看新聞，精神上短暫抽離職場環境之時。在阿力過世以前，他沒有在上



述任何一份工作持續做超過一年；透過頻繁地轉換工作，他努力找尋不那麼無意義且薪水堪可的工作，但是如同上一節所述，由於學經歷的限制，以及過往工作習得的技能無法累積至下一份差異甚巨的服務業工作，阿力還是難以脫離次級勞動市場的循環。

類似的求職困境也出現在光光畢業後的日子，而光光試著透過兼併數份工作與出讓工作時間穩定性等調適策略來克服困境。今年二十五歲，光光已經在餐飲服務業工作近十年，他熟悉餐飲業「桌邊服務」的技巧——記下特定客人喜好、主動寒暄詢問個人化需求、誠懇禮貌地服務顧客——懂得如何令顧客留下備受尊寵的感受，因此受到中餐廳領班的青睞，領班也經常在同事前公開表揚他的工作態度。不過就在畢業後，有回領班語重心長地建議光光轉換跑道，並以自己升上領班後僅加薪三千元作為告誡，認為他還年輕，應該多試試其他不同職能且更有長期升遷可能性的工作。值此，光光正式踏出餐飲服務業，進入網路服飾品牌，成為一名派遣的倉庫物流包貨員。不過由於仲介會從中抽成，派遣工作的薪水並不如餐廳正職來得多，為了維持總月薪，光光安排自己週一至週日都在上班：一到五做倉庫物流包貨員，六日則抽空回到中餐廳工作，如此一來「一個是心累、一個是身體累，這樣可以休息到」。看似理想，此舉卻適得其反。由於整個月幾乎每一天都在上班，光光經常感到身心俱疲，因此偶爾會請假來「自我犒賞」，到頭來雖然兼併了兩份工作，但總月薪加起來還不及過往在中餐廳當正職員工的薪水。繞了一圈，八個月後，光光再次回到那熟悉且更令他感到成就感與驕傲的中餐廳上班，在此處透過出讓工作時間的穩定性¹³來換取比一般餐飲服務業更高的薪資：一個月三萬元。

類似的求職策略，即透過出讓工作時間的穩定性來換取更高的總月薪，也是小翔理想中的求職策略。畢業後，小翔繼續在建教合作時期工作的連鎖速食店上班一年，由於沒有通過內部升遷的 SOP 考試，他打算離開並找尋更高薪的工作機

¹³ 雖然身為正職員工，但中餐廳的排班機制是每天午夜十二點時宣布隔天每位正職與兼職員工幾點上班、上班多長時間，因此光光得忍受上下班時間的高度不確定性，這也連帶地影響他與小翔的親密關係。關於台灣餐飲服務業的排班工時不穩定性，目前國內僅有一份餐旅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可供推測此個案是否為普遍狀況或特殊案例（李金坤，2008）。另外，關於小翔與光光的親密關係如何受到排班機制影響，請見第四章第二節。

會。我問他打算找什麼類型的工作，他說不會特別限制自己要往哪走，不過最好是夜班或是不定時班的工作，這樣子薪水才會高；況且他現在也不介意休息時間與其他親近的友人或愛人錯開，因為現在的親密關係已經變成了開放式關係¹⁴。不久後，小翔如願成為印刷工廠的學徒，通常週一至週五上大夜班，有時若有急件則會白天也加入排班。在這份工作，小翔的薪水確實上漲到三萬三千元，比過去所有的工作都來得高。不過工作了三個月後，老闆以他經常臨時請假為由，試圖將他從正職員工降為 **Part Time** 人員，維持一樣的上班時間段、長度以及不穩定性，但給予更低的薪水。小翔相當不服，可自己也沒有什麼籌碼與老闆談判，在得知消息後，便在農曆年前主動離職，再度找尋下一份工作。

無論對眼下的工作感到極度無聊而意欲逃脫，或是能從勞務中體驗到成就與驕傲，肇因於學歷的限制，報導人們相當高比例地、連續地從事著各式低薪的服務業，少數的人則偶爾涉足製造產業。為了提高總月薪資，報導人可能兼併數份工作，或是主動出讓工作時間的穩定性，特意找尋夜班或是不定時班的工作，藉此跳脫出低總月薪的循環。報導人參與次級勞動市場時所面臨的工作處境，相當類似林宗弘等（2011: Ch3）所描述的「工作貧窮化」現象：解嚴以後，加上全球資本的移動能力提升，台灣的低階製造業開始大量外移，服務業成為台灣勞動市場大宗，不過由於其產值並未大幅提升，使得雇主為解決「成本弊病」而傾向於壓低服務業薪資，帶動整體服務業的總月薪資集體下降。

面臨勞動市場普遍工作貧窮化的情境，加上學歷與過往工作經驗均難以與其他勞工競爭，除了兼併數份工作或是出讓工作時間穩定性等策略，有些報導人想到了一種可能縮短工時並提高時薪的工作，也就是投身男男間的性相關產業。

三、不穩定未來：男男間性相關產業

阿力：我之前在高雄的時候有考慮過去做色按（編按：男男色情按摩），或去酒店當少爺，但不知道怎麼跟家裡講……喝酒很傷身，而且我又不帥又沒

¹⁴ 關於勞動時間安排如何影響親密關係的形式，以及小翔和光光這對情侶如何協商為開放式關係，請見第四章第二節的討論。

身材，怎麼做？

(2020.12.07, 阿力凌晨通話, 頁 2)

小藍：我身邊很多酒店工作的朋友會被騷擾、強暴……但那是你的選擇，如果你做得不開心就離開，要是繼續待在裡面，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2020.11.13, 小藍一訪, 頁 16)

對於男男間的性相關產業，報導人們的態度頗為曖昧，但總歸來說多是負向的。一方面，他們對此類型工作的既定想像是短工時且高薪，但因為無從得知實際從業情況，也不敢貿然投入；另一方面，他們擔心投身相關產業後，不知道怎麼和家人及朋友解釋自己突然上升的薪資來源、不敢向他們提起此工作。雖然大多抱持著較負向的態度，但性相關產業仍對報導人們構成潛在的吸引力，尤其當他們經歷過好幾年在次級勞動市場上的探索與碰壁後，逐漸認知到依自己現有的學歷與工作經歷，很不容易覓得高薪且穩定的工作。

幾乎每位報導人都曾向我半開玩笑似地提起要做男男性工作，語境多半是覺得工作加薪無望，認為倒不如來販賣自己的身體，以及販賣自己在同志圈內打滾多年所習得的性愛技術。話雖如此，真的與性相關產業有所接觸的僅有三人，其中兩位是主動接觸此產業（一位成功入職、一位被拒絕），而一位報導人則是側面被迫捲入。主動投入此產業的第一人即小藍，訪談時約二十八歲，在藝術大學畢業以後，依著自己的興趣，投入電影公司裡頭工作。這是他熱愛的產業，不過公司的老闆相當恐同，雖然偶爾會接與同志議題相關的拍攝案，但僅僅是藉此賺錢，大多時候老闆還是很喜愛對同志群體冷嘲熱諷，讓他在職場上備感壓力。工作一年後，尾牙時老闆再度在台上講著慣常的恐同玩笑，加上沒有獲得加薪，小藍果斷地在領完年終獎金後遞出辭呈。

離職後，小藍希望憑藉在藝術大學所學來自行接案，兩年以來生活也還算過得去。在求職網站上零星地接拍片以及剪片的案子，客源多時一個月最多可以賺到五萬元，客源少時曾經一整個月收入為零。自由接案兩年下來，小藍的平均月收入大概落在兩萬元，他漸漸認知到這並不是長久之計，不過也想繼續待在藝文

相關產業，便開始找尋藝術行政的相關工作，轉做與拍片較無關的各類行政事項。不過藝術行政大多都是短期聘僱，少則兩週、長則半年，月薪又多半落在法定基本工資，雖然興趣相對符合、職場環境令他熟悉，但小藍還是不甚滿意。恰好小藍本就認識在酒店業以及男男按摩業工作的朋友，加上他對按摩業並不排斥，便請他們介紹自己去面試，希望找找看更高薪的機會。

本以為是朋友介紹過去，應該挺有機會入職，不過出乎意料地，小藍連續面試了兩間男男按摩店都沒有被錄取。其中一家的店長認為他的長相不夠「主流」——沒有蓄鬍、不夠陽光，也不夠「Man」——另一間店則認為他的身材不夠精實，這都顯示了欲投身性相關產業的男同志所面臨的困境：除了需要規管自身的性／別氣質以外，在入職之前，同志按摩男師就已經需要投入時間與資本，將自己打造成同志圈內可欲的性客體。然而這種事前的隱形勞動（shadow work）需要自費吸收，也不保證投入資源後就一定能夠順利入職，無疑對於欲投身此產業的危殆男同志形成就業阻礙及風險（陳伯偉、王宏仁，2018: 549）。

另外一位被側面捲入性相關產業的報導人則是阿力。在被手搖飲料店辭退以後，2021年夏天，阿力的身心狀態始終沒有很好。母親的經濟狀況自身難保，而阿力也暫時沒有動力找尋工作，正面臨著付不出房租的窘境，恰好此時他在臉書上的同志圈內租屋社團看到一則租屋廣告，該雅房位於新北市，不僅房租低廉，且房東願意提供洗滌用品以及三餐，阿力馬上聯繫入住。入住後不久，他才瞭解到房東的真實工作，其實是經營販毒網絡以及舉辦男同志圈內的付費用藥性愛派對¹⁵，而房東也數度問他想想「幫自己做事」。阿力認為，畢竟自己拿了對方不少好處，像是免費的洗髮精、沐浴乳，或是偶爾對方會買三餐回來給他吃，好像也不太好意思拒絕，便嘗試接下了這模糊的「做事」要求。

不過這「做事」究竟是不是一份工作，阿力自己也說不清，因為對方不會在他每次完成任務要求後立即給予現金回饋，而是透過持續提供三餐、洗滌用品，以及偶爾免除雅房月租來當作「回饋」。這些任務內容起初大多是運送毒品至指定買家的家，這些阿力還能勉強接受；一兩個月後，房東開始要求他做得更多，

¹⁵ 關於台灣類似的「男同志轟趴」經驗研究，請參考杜思誠（2008）。

例如「陪客人玩一下」，即在毒品送達後與對方共同吸食，或是與對方發生性行為。阿力無可奈何，數度想搬離此處，但因為缺乏其他立即的工作機會，也沒有足夠的存款支付新租屋押金，只好暫時繼續居住於此，並持續完成房東交辦的任務，兩人因此經常爭執。又過了半年，我從另一位報導人口中聽聞阿力的死訊，起因據說是房東懷疑他向警方告密，使得自己的販毒事業以及性愛派對事業受影響，不分青紅皂白地尋仇攻擊他。

最後一名主動投身性相關產業的則是報導人飛飛，他是唯一一名順利入職且成功改善了自身的經濟狀況者。從私立大學觀光系畢業以後，由於聽聞觀光產業即將凋零，飛飛沒有投入觀光業，而是開始尋找著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在大學畢業後的八年間，他從事了近二十份工作，短則一個月，最長的一份則達到一年，內容差異甚巨，但大多是服務業，例如園藝店店員、保險業務員、飯店房務員、電子公司行政櫃檯、NGO 辦公室秘書等等。這些工作的薪資大多落在基本工資，也不太有內部升遷管道，雖然多方嘗試，但飛飛始終沒有想要長期操持同一份工作。恰好此時，幾位與飛飛有共同「調教」¹⁶興趣的友人詢問他是否想要做調教來兼差賺錢，開啟了飛飛投身性相關產業的契機。

由於平時經常接觸並實際操作調教，有過好幾年當「主人」經驗的飛飛順利地進入此產業。飛飛參與此產業可透過僱傭型態來區分不同階段：在第一階段，飛飛隨著友人舉辦的派對活動偶爾執業，屬於不定期的兼差；第二階段，飛飛受僱於情趣用品店，轉為領取固定薪資；第三階段，飛飛進一步選擇自立門戶，自行接案並擁有多重的收入來源，類似自營作業者。

第一階段，飛飛跟隨著調教圈的友人舉辦收費的調教性愛派對，派對上飛飛負責施展調教技術，讓派對參與者體驗繩縛、鞭打或懸吊，其他工作人員則在席間販賣助興藥品以及維持場地清潔及秩序。飛飛表示，通常一場派對連同調教以及賣藥的分潤，他可以在一個晚上獲得近一萬元。不過舉辦類似的派對並不容

¹⁶ 大學畢業後，飛飛開始接觸「調教」這種新型態的性愛方式。他認為調教與其他男同志常見的性愛方式是不同的：不同於著重性器官高潮的性愛形式，調教更重視的是由肉身至精神的控制，例如「主人」對「奴隸」施加身體疼痛、限制行動自由，或是禁止獲得性器官高潮等。關於調教（或廣義的 BDSM）的實踐研究，請參考黃詠梅（2008）。

易，除了需要隱秘地徵集夠多參與者，也需要頻繁更換空間夠大的場地以避免受人檢舉，因此平時一個月可能僅有一至兩場，通常只有在台灣同志大遊行前後，派對的數量才會大漲，平時派對的數量僅夠飛飛打平日常開銷。



在第三階段¹⁷，飛飛自立門戶，自我命名為一位專業的「調教師」，並開發了兩種盈利模式，此階段的總月收入通常在七萬至八萬元。第一種盈利模式是開班教授「調教」的技術，透過收取一個月兩千至三千六百元不等的學費，並同時收取多名學生，在全盛時期，飛飛的教課月收入可達三萬至四萬元左右。第二種盈利模式則是在網路上販賣調教影片。不同於第二階段時期，「奴隸」們付錢請飛飛來調教他們，在第三階段時期，飛飛與他所調教的奴隸之間沒有直接金錢往來；反之，在徵得奴隸同意之後，飛飛將調教的過程錄影下來，放到網路平台販賣，以此賺取購買者的「訂閱金」，此舉相當類似於近年來新興的「網黃」¹⁸經濟。不過飛飛認為自己與其他知名的「網黃」並不相同，他並不過分強調性器官的高潮，而旨在創造一場精緻的調教。身為一名調教師，飛飛注重的是深入瞭解雙方各式需求與喜好的「有溝通的調教」，因此他在調教前總會花上一至兩個小時，先與奴隸做事前諮詢，量身打造一套奴隸喜愛的調教流程，期間不見得包含著傳統意義上的性器官高潮，而是透過影片傳達「控制」的全面與深刻，以此建立自己與其他「過分注重性愛的」網黃的高低之別。

雖然現在的總月收入比起過去的幾種工作都高出許多，不過隨著年近三十五歲，飛飛正打算著離開調教產業，因為後起之秀越來越多，而且自己年紀逐漸增長，他評估未來拍影片的收益可能會越來越低，畢竟觀眾們更喜歡年輕的肉身。在這樣的考量之下，加上飛飛對於過往的薪資勞動缺乏興趣，而他恐怕也很難向新的雇主解釋自己過去三四年以來的主要職業——男男間的性相關產業——因此目前飛飛正嘗試轉換至一種新興型態的非典型工作，即考取國際塔羅牌證照以及

¹⁷ 關於飛飛的調教職涯如何從第二階段轉至第三階段，請見第四章第一節，此處不重複敘述第二階段的内容。

¹⁸ 目前國內尚無關於「網黃」的相關研究，筆者嘗試簡短說明：在 Tumblr 以及 Twitter 等可發布裸露身體之影視內容的社群平台興起後，加上 OnlyFans 等付費訂閱的自媒體影音平台出現，開啟了新型態的網路性工作型式：拍片者將性愛錄像上傳至 OnlyFans 平台，並在 Tumblr 或 Twitter 等網路平台宣傳，即可吸引粉絲至 OnlyFans 付費訂閱，賺取訂閱費。拍片者通常被稱為「網黃」，意指在網路上發布「黃色」（色情）內容者，此名稱係改寫自「網紅（網路紅人）」。

國際「心靈諮詢師」證照來「執業」，如此即可不用再度受僱於人，並有機會將他原本的「客戶」們轉換過來。



如同過往研究指出，無論是異性戀女性或男同性戀，性工作的從業者大多是在歷經了低薪勞動市場的波折以後，在生命中某個重要或緊急的時刻（critical moment），經由社交網絡中的人介紹後才進入相關產業當中。可以這麼說，各種不利的結構及制度條件，加上個人原生家庭的貧困，正形塑著從事性相關產業的「產業預備軍」（陳美華，2007；江紹祺，2018: Ch7）。在本節當中，我們看到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參與性工作的幾種可能路徑：例如飛飛，透過多種僱傭型態（無明顯雇主的合夥、受僱、自雇）的性工作，在短短三四年間改善了自身的經濟條件，不過未來的經濟狀況是否安穩仍未可知；例如小藍，雖然有意加入按摩工作室成為受僱者，也獲得友人介紹，但因為無法完成隱形勞動的前提而遭到雇主拒絕；又例如阿力，在經濟挫折的意外之中，成為沒有實際名目的「做事」者，既無法領取「應得」的高額薪資，更被迫從事著自己本不想從事的性工作。

至於性工作是否真能許諾貧窮男同志一個經濟穩定的未來藍圖？從飛飛嘗試轉換職涯的過程，我們可以推測江紹祺（2018: 267）所言真確，即男男性相關產業從業者高度競爭著外貌及年輕肉身，也因此三十幾歲的飛飛自覺「到了該走的時候」。不過飛飛其實也很難向他人——尤其是未來新的雇主——提起這幾年的工作經歷，因此他正規劃著從事一份新的非典型工作。我們或可推論，曾經從事過男男性工作，在履歷上或許將成為一種新型態的「疤痕」，短期之內確實提高了經濟收入、改善了窘迫的經濟現況，但是這項工作經驗將對尋覓下一份穩定的工作將形成阻礙；更重要的是，這份工作並無法長久維繫，可能導致從業者繼續從事危殆工作。

四、小結

在本章，我們對於報導人們——年輕、工作總收入低、原生家庭不富裕的男同志——過往的教育軌跡以及勞動生活有了大致的圖像。受制於原生家庭不富裕的經濟條件，報導人可能被迫中斷學業，或是主動選擇能立即獲得經濟收入的建

教合作計畫，藉此奠定了對特定勞動類型的熟悉與嚮往，漸漸模塑他們未來的求職路徑。



不過受制於學歷，也受到台灣普遍服務業「工作貧窮化」現象的影響，在大學畢業之後，多數報導人接連從事著低薪且長工時的危殆工作，即便歷經多次轉職，仍大多從事著內容不同，可同樣低薪且備感無聊的職業。針對這個困境，報導人們採取了三種不同的勞動調適策略：有些人選擇合併多份職業以提高總月收入，有些人選擇出讓工作時間的穩定性以換取高時薪與高月薪，有些人則選擇進入男男性相關產業之中。不過到頭來，性相關產業似乎沒有辦法提供一個長久經濟穩定的未來藍圖。報導人們仍在努力找尋出路，嘗試突破過往學經歷的限制。

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是否註定在教育成長及求職歷程中受挫呢？Stacey (2019[2011]: 89-94) 試圖指出一種「學不做工」的可能性：相較於英國社會學家 Paul Willis (1981) 刻畫的英國勞工階級（異性戀）男孩受教育成長的歷程，Stacey 發現許多年輕男同志有可能因為在幼年時就發現自己的情慾不同於其他異性戀男性同儕，或者因為陰柔氣質受到環境排斥，因此很早就試圖找尋另類出路，她的許多報導人走往藝術文化領域，或是持續刻苦地學習，以期自己能夠脫離恐同的原生家庭環境，甚至因此有能力移居至大都市當中。這間接造就了他們經歷社會流動，其幅度要比他們的異性戀手足大得多。

在本研究當中，我在職業現場見到類似軌跡的變體，即他們受益於自身的陰柔氣質，不過在教育路徑上並沒有看見這樣的現象。報導人們選擇高職或科大的科系時仍多以未來可以迅速就職為依歸，阿力對於歌唱的興趣也是在進入表藝科就讀後才逐漸發展（或增強），同志身份或陰柔的性別氣質對於教育選擇似乎影響不大；不過陰柔氣質對於男性參與餐飲服務業則有加分作用，像是光光在中餐廳當外場服務生時，他總能自如地與男性或女性顧客來往，熟客們也很喜愛他有點「三八」的幽默表現，這或許是光光將男同志圈內互動的方式搬演至職場所致。這樣的互動搬演的確讓光光受到客人以及主管青睞，不過仍未能強大到令光光的經濟狀況大幅改善，也令我質疑「學不做工」這論點，我認為這不見得會強力地促使危殆男同志歷經社會流動。

即便面臨勞動生活的重重難題，報導人們仍然對於同志圈內的情愛生活及性愛生活有諸多嚮往，大多數人也渴望有天找到那「對的人」締結同性婚姻。只是在參與圈內社交時、在經營長期情感關係的過程中，他們又不免要考量窘迫的經濟條件以及日常勞動安排，且其他相對富裕的男同志恐怕也不易理解箇中難題。在接下來的兩章當中，我們將看見報導人如何受制於上述條件又如何與之周旋，開展出不同的感情形式。

第三章

圈內社交的金錢課題：性感階序、情愛消費與尊嚴



2021年初剛跨年不久，阿力約我到大稻埕散散心。散步途中，阿力的手機不時傳來震動聲。每當聲音響起，他會馬上點開訊息，查看對方的照片並迅速回覆，過程熟練自如。餘光瞥見他正在使用同志交友軟體，上面自我介紹寫著「感染者、原住民、愛唱歌……以結婚為前提交往，想找到一起陪伴下輩子的你<3」我好奇地問他最近在軟體上認識新朋友還順利嗎？他嘆了口氣，說最近想認真地找交往對象，不想再像過去一樣一直約炮。但無奈的是，前陣子以為可以發展感情的對象似乎只想與他做愛，對交往則毫無興趣。

如同當今大多數年輕的男同志，報導人們同樣寄望於同志交友軟體（以下簡稱為「軟體」），期待從中找到未來的人生伴侶；只是不巧的是，此刻阿力的性伴侶並無意與他建立長期情感關係。不過正如 Stacey（2019[2011]: Ch1）所指出的，男同志彼此之間豐富的性愛活動，其實有機會產生多樣的親密關係，像是友伴關係、長期砲友、相互照顧的類家庭關係，或是具親密承諾的長期情感關係。換句話說，對於本研究而言，在考察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長期情感關係時，有必要將尚未步入交往階段的性愛互動與情感交流（以下統稱為「圈內社交」）納入分析當中，因為它們有可能轉變為多種不同的長期情感關係。此即本章節的分析對象與目標：觀察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的過程，並指認此過程如何受經濟條件以及金錢使用所影響。

本章依循現象上出現的時序，從兩面向——線上結識與線下長期互動——考察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的困境。首先，在軟體上以及初次實際見面時，男同志之間強調陽剛視覺外貌的文化，其實已內蘊對經濟能力的篩選，令報導人們難以進入性感階序（*sensual hierarchy*）的評價系統之中；其次，在線下長期互動中，男同志間依循著性／別角色範疇的「情愛消費」確實可能增進雙方情誼，但對於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來說，此舉卻可能導致尊嚴受損。



一、先於性感階序的經濟篩選機制

過往研究已指出性感階序 (sensual hierarchy) 是影響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的重要結構力量 (林純德, 2009), 後續研究援引此概念, 用以考察男同志圈內依據肉身外型所做的動物分類次文化¹⁹ (莊育碩, 2016; 黃紹謙, 2019) 以及軟體上重視陽剛的視覺文化 (林冠廷, 2019)。根據林純德 (2009: 142) 的定義, 性感階序指的是:

立基於「性」(性角色、性能力、性向)、「性別」(陽剛、陽光、粗獷)及「身體」(身材、五官、鬍鬚體毛)等基礎〔的一組上下階序〕……社群成員在進行情慾互動及經營社交關係時, 往往因為其在此階序上的位置差異而享有不同的權勢與待遇。

此視角的確精地準捕捉到男同志的圈內社交文化特徵, 可惜的是, 前述相關研究多強調陽剛氣質和肉身外貌所透露的性愛吸引力, 男同志的「身體」被視為是性愛吸引力的載體, 而非經濟能力的具體體現, 也因此並未考量經濟匱乏者如何參與圈內社交的問題。本節資料將顯示, 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在參與圈內社交時, 恐怕因其視覺外貌所透露的低社會經濟條件, 被排拒在性感階序的遊戲之外; 換句話說, 要成為在性感階序上可慾的 (desirable) 男同志, 必須先成為一名擁有體面 (decent) 外貌的男同志。先於性感階序的經濟篩選機制, 可能排除了經濟危殆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的機會, 並阻礙其組建長期親密關係。

對於年輕世代的報導人而言, 相較於過往研究頗豐的男同志酒吧、公園或三溫暖等實體圈內社交空間 (吳佳原, 1998; 張銘峰, 2002; 吳文煜, 2003), 軟體才是最首要的圈內社交空間。如林冠廷 (2019) 所指出的, 在 2010 年前後智慧型手機與軟體逐漸普及, 由於其兼具匿名性與適地性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²⁰等特性, 很快就成為年輕男同志們初次接觸彼此的首要空間, 它也吸

¹⁹ 亦即透過肌肉量、胖瘦程度及陽剛氣質, 將男同志區分為「熊、猴、狼、豬」的次文化, 通常位於階序頂端的是「狼」, 位於底端者為「豬」, 許多人傾向尋找同類型的人進行社交或交往。

²⁰ 透過定位使用者的地理位置, 推送距離最近的相關消息, 運用在同志手機交友軟體上, 則能顯示距離最近的其他用戶, 讓同志能在虛擬空間中與實體距離最接近者相互交流。

納了過往許多實體同志空間的功能，諸如即時性愛、促成友誼及找尋伴侶等。不過軟體介面設計的技術政治性，促成了更加激烈的陽剛競逐與身體展演，這是因為照片——肉身的視覺載體——是構成軟體使用介面的核心。在軟體上，有時甚至毋須閱讀更細節的文字自我介紹，在照片這關就已經完成了篩選作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一回我在田野機構開會，主題是「如何幫助『社交困難』的男同志——不熟悉交友軟體、平時少有同志友人者——順利使用交友軟體」，會議中一項重要的結論是「好的照片就是成功的一半」，最終的行動方案則是舉辦一場拍照工作坊，帶參與者一起拍出好看的照片，並交流彼此使用交友軟體的各式心得。當大家在爭論何謂「好的照片」時，其中一位二十多歲、剛出社會的男同志說一定要放自己上健身房的照片，這樣才能凸顯自己愛運動、身材好，更容易約到炮；另外一位五十多歲、職業收入頗豐的男同志小高則給出了不同的詮釋：

小高：放健身房的照片是為了要凸顯自己的收入夠付健身房會費，就算沒運動，也能展示自己的經濟能力……挑風景照或出去玩的照片也要用心，你挑一張去歐洲玩拍的照片就是一種暗示，比起在宜蘭出去玩拍的照片，哪一個更有錢？

（2021.02.04，彩虹基地田野筆記，頁1）

小高對軟體照片的解讀，反映了照片不只可能作為性愛吸引力的載體，照片及其脈絡更是經濟能力的具體體現，其成為比性感階序更優先的篩選條件。縱使初始目的主要是約炮而非尋覓伴侶，對於小高來說，透過拍照的情境來展示／解讀背後的經濟能力依然重要，這甚至左右他是否願意與對方赴約，因為他不希望負擔風險，怕約出來的人與他的經濟能力相差甚巨，不令他喜愛。這同時反映了軟體的一項重要特徵：相較於在實體的同志空間中相遇，因而僅能在有限的時間及人選中物色對象，軟體創造的虛擬空間延長了選擇的時間、擴大了選擇的地域，使男同志們不必在有限的人選中「將就地」選擇，不過這似乎也削弱了過往同志實體社交空間所具備的忽視階級差異的特性：如吳文煜（2003: 80）所指出的，在1990年至2000年左右，高雄勞工階級的男同志經常在下班後進入特定的

同志公園或三溫暖，透過立即性愛抒發一天的辛勞，過程中有機會觸及社經地位比自己更高的男同志，因為昏暗的燈光令人難以觀察彼此身上的階級特徵，且眾人對於階級差異也不甚在意，能夠遇到喜愛的對象已是萬幸。



男同志的經濟能力不只在軟體上受到檢視，在最初幾次實體見面時，也成為是否持續聯絡的關鍵之一，其體現在個人的肉身外貌與衣著之上。阿力曾向我抱怨，他與一位小他一歲、正就讀藝術大學的網友在網路上相談甚歡，聊了兩週後他們還未確定是要約會或是約炮。不過初次見面，這段剛萌芽的關係就宣告終結。兩人在大稻埕一碰面，對方便皺緊眉頭，開始嫌棄他的髮型、穿著與長相：

阿力：他後來直接帶我去無印良品，跟我講穿搭的概念，第一次見面而已有必要這樣嗎？（我：那你有想要換個風格嗎？）我會想改變一些穿著，但有時候就，因為我對穿著也沒到很有想法，我就只是穿個簡單的這樣，比如說牛仔褲或是運動風這樣²¹，就簡單。然後他就說不應該這樣啊，要穿一些襯衫啊，讓自己好看一點啊。可是好看就要花錢，對啊，啊我就沒什麼錢，哈（苦笑）……然後，他說他喜歡穿有牌子的東西，我聽到就覺得很傻眼，結束後我就封鎖他了，白眼翻到極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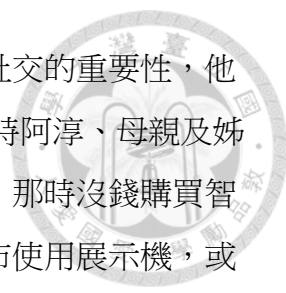
（2021.01.10，阿力田野錄音，頁 1-2）

藝大學生對體面外觀的定義——保養好皮膚²²、打理好頭髮²³、穿襯衫類型的衣服——並非阿力現在的經濟能力所能及，且阿力也理解，若以現在的外觀示人，對方不會願意再與他見面，便先發制人地封鎖對方、終結這段關係。在描述雙方對衣著的品味時，阿力將自己定位為「簡單」，並透過強調對方喜愛「有牌子的東西」，試圖塑造出樸實無華與揮霍消費的對比，藉此來彌平甚至反轉經濟能力難以企及對方心中標準的不適感。

²¹ 每次見面時，阿力穿的衣服都相當類似：下身著灰黑色棉質長褲或牛仔褲，上身是素灰色棉質長袖T恤，再搭配同一件黑色棒球外套。

²² 阿力的臉頰及額頭有些痘疤（但軟體上的照片看不出來），令藝大學生感到不滿甚至受騙。

²³ 這也與阿力的髮質、髮量有關。或許肇因於基因與保養方式，阿力的髮線稍高，且髮質油油亮亮的，稍微粗一些，當時藝大學生強烈建議他要投資資源打理髮型，「去彌補先天不足」。



類似地，阿淳也向我提過經濟能力與體面外觀對參與圈內社交的重要性，他的困境同樣出現在從軟體銜接至實體見面時。2015 年左右，當時阿淳、母親及姊姊處在無家狀態，有時會睡在大學宿舍，有時則一起睡在公園。那時沒錢購買智慧型手機，但又想與其他男同志接觸，阿淳經常會在電信行門市使用展示機，或是透過市立圖書館的公用電腦使用軟體及同志交友網站，斷斷續續地聯繫網友。不過阿淳總極力推辭與網友們實際見面，因為他不曾向他們提起自己貧困的生活處境，且擔心見了面，他的衣服、髮型及氣味會暴露他的生活狀態。在聊了兩個多月後，一位網友堅持與他約出來見面，他才不得不從宿舍曬衣間偷拿了幾件乾淨的衣服，半夜悄悄離開家人與對方會面²⁴。不過這段關係並未能持續下去，由於打理好外貌及躲避母親的追問實在太費心力，阿淳總是三番兩次地推辭見面，對方便判斷他無意深入發展關係，逐漸斷了聯繫。

上述田野資料指出，在進入性感階序的評比過程之前，參與圈內社交的男同志們就會先檢視照片脈絡、衣著髮型乃至體面外貌所透露的經濟能力，並且據此篩選是否持續聯繫；報導人們如阿力和阿淳，他們都感受到此種經濟篩選機制的壓力，在難以企及對方心中的經濟標準時，傾向於主動退出社交過程，選擇等未來經濟狀況好轉後再度參與圈內社交。

倘若男同志們順利通過了經濟篩選與性感階序的評比，步入第二、第三次會面，在正式交往以前，關係還有多樣的發展可能性，可能轉變為友伴關係、砲友關係、交往關係，或者相互混搭。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中，男同志們經常透過「情愛消費」的策略來轉換並確認關係，使之從純粹的性愛夥伴轉變為更緊密的情感交往關係。在下一節當中，我將先定義何謂「情愛消費」，並指出過往研究對此類實作的既有發現，最後透過飛飛的案例說明：貧困的童年經驗，可能使情愛消費的接受方對此實作的意義詮釋產生變化，甚至可能導致個人尊嚴受損。

²⁴ 阿淳表示這幾次會面令他與母親的關係變得極為緊張。每晚他們全家人會睡在一起，物理距離極其接近，因此若阿淳不在身邊幾個小時，馬上就會被母親發現，但他又難以給出不會出櫃的合理理由，母親懷疑他想脫離三人共居的生活，對他更嚴加控制。

二、尊嚴之爭：情愛消費的雙面效應



在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的過程中，鑲嵌在圈內性／別角色範疇的「情愛消費」是相當常見的親密經濟實作。我將情愛消費定義為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的一種子類型，意指行動者透過共同金錢消費來表達真切情感，用以鞏固甚至提升既有性愛關係的親密程度。在充滿變數的圈內社交中，約砲關係可能透過多次的情愛消費轉變為交往關係。在田野當中，報導人經歷過的情愛消費具體例子，包含請吃日常的平價餐食或高檔的餐廳、購買生活必需物資或是贊助至外縣市共同旅遊等，涵蓋生活的必要支出與非凡的娛樂享受。

在過往的同志民族誌中，我們可以見到近似於情愛消費的親密經濟實作經常是鑲嵌在男同志圈內的性／別角色範疇來運作。例如 Zheng Tiantian（2015）針對中國大連地區男同志的田野研究指出，類似台灣與香港，中國的男同志也廣泛使用「1號」與「0號」來界定人群，這套圈內性／別角色範疇不僅指涉性行為的插入方與被插入方，更援用異性戀的性別角色意識形態加諸於互動過程，例如1號經常扮演異性戀男性提供情緒照料與經濟支持的角色，0號則通常像異性戀女性一般，接受照料的同時也讓渡部分權力，居於關係中的從屬地位。不過0號們並不總是全面援用異性戀女性的角色與性別期待，為了自身好處，他們可能部分援引並部分抗拒，一方面持續要求1號進行消費以免除自身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試圖掙脫關係中的控制，積極拓展原先受制的性愛實踐。

在 Zheng（2015）的討論當中，鑲嵌於圈內性／別角色範疇的情愛消費是0號難以割捨的「特權」，其大多能為關係增添親密情感；在蔡孟哲（2009）關於台灣男同志性／別角色分類的研究中，能否完成情愛消費則成為界定一個人是否是位「好的1號」的重要參照基準，同樣暗示著情愛消費對於維繫關係的正向功能。在本節當中，我則將透過三位報導人的例子指出，鑲嵌於圈內性／別角色範疇的情愛消費的確有可能提升關係的緊密程度，但對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如飛飛——來說，接受情愛消費的過程反倒可能導致尊嚴喪失。



(一) 同時維繫內外感情：情愛消費與關係命名

交往第三年，報導人小翔與光光步入了「性方面的開放式關係」²⁵，同意彼此都可以向關係外的人約炮，這讓小翔有機會認識他的「乾哥哥」阿權。當初會這樣安排關係並非小翔不那麼愛光光了，他之所以會提出要求，主因是光光的工作生活以及時間安排很難與自己契合，一方下班時另一方通常還在上班，情況嚴重時還會整整兩週都難以見面。對小翔來說，他仍渴望可以與人面對面抒發一天下來的情緒，也希望可以獲得更多性愛體驗，因此雙方說好把關係「打開」，不過底線是不可以與炮友產生感情。

關係打開後，小翔最常用來約炮的管道就是軟體。身為一名「弟弟」，在軟體上，他通常都會試探性地叫對方一聲「哥哥」，用來測試對方是否與他擁有類似的圈內性／別角色範疇想像，同時確認雙方角色是否互補，以此決定是否持續聯繫。在台灣的脈絡當中，男同志們可能會使用「1/0」或「哥／弟」這兩套範疇系統來界定人群，不過蔡孟哲（2009: 31）指出，即便這兩套系統都與異性戀性別意識形態有所連結，但「哥／弟」這套範疇系統可能隱含著更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在本研究的七位報導人當中，有六位通常只援引「1/0」範疇系統來區分男同志，只有小翔會交替使用這兩套系統；而另一位報導人方方則表示「哥／弟」範疇系統「很 low……像是上一輩會講的」，我推測這類似女同志社群對於「T婆／不分」的爭論：爭論背後潛藏的是女性主義社群對於性別平等價值的追求，並透過「落伍」等隱含線性時間觀與價值階序的語彙來指責看似較為服膺性別刻板印象的「T／婆」分類系統（Chao, 2000: 387）。照此邏輯，方方之所以認為「哥／弟」很「low」，原因正在於其隱含著更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

對於身為一名「弟弟」的小翔來說，他在關係中習慣享受來自對方的情緒照料與經濟支持，對於情愛消費的詮釋態度則多是正面的。不過在下文當中，我們將發現小翔並不全然擁抱「弟弟」所蘊含的霸權性別意識形態，亦即他不認為自己的身體與性慾需要完全受到類似「男方」的「哥哥」以及 1 號男友所掌控，而是會透過「關係命名」策略來與此種霸權性別意識形態斡旋，在縫隙之中拓展自

²⁵ 關於這段關係如何走向開放、與勞動時空安排的關聯，請見第四章第二節。

身的性慾情感實踐。



歷經了幾年的「性方面的開放式關係」，前前後後認識不少哥哥，小翔遇見了阿權，從炮友開始，兩人漸漸萌生感情。阿權現年約三十五歲，在電信行當櫃檯人員，一個月的收入大約三萬五千元。由於同樣租房在台北，加上收入並不算特別高，阿權在台北也僅算勉強過得去，不過憑藉著精打細算的功力，阿權每個月總能存下約五千元，狀況好時還可以資助小翔。兩人與其他炮友不同的地方在於非常聊得來，以小翔第一次對我提及此人的說法就是「聊久了就變成永久的朋友」，只是這所謂的友誼還包括頻繁的性行為、情感依賴以及共同消費。通常見面時阿權都會請小翔吃個飯，不是特別貴的精緻餐點，而是尋常的午晚餐，小翔認為這是對方怕他餓著所做的體貼行為，因為阿權對小翔的生活窘迫程度瞭若指掌，因此會在能力範圍內協助他，甚至也曾幫小翔買過捷運月票卡。上述種種的情愛消費，在這段關係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兩人的性關係逐漸升溫為沒有正式名分的情感關係。

這樣的關係已漸漸逾越了小翔和光光當初的協議——只能找性不能有愛——因此小翔試著用特定的關係稱謂來向他人解釋／掩飾他們的關係。有回我在同志大遊行恰巧碰見小翔與阿權（事後推算他們這時剛認識一個月），小翔對我宣稱這位是他的「朋友」，試著透過友誼稱謂來向我掩飾當時仍未明朗、正在萌芽中的情感；對光光則說這位是他的「乾哥哥」，以此合理化小翔向阿權借錢周轉，以及阿權斷斷續續地請他吃飯或是支付小額日常花用的行為，使之看來像是「哥哥對弟弟的尋常照顧」。不過小翔其實是明瞭的，阿權自己的積蓄並不多，他還願意替小翔支付小額的日常支出，此舉是在表達心意，試圖將情誼從炮友再往上提升。不過礙於小翔仍有既有的交往關係，且他也沒想過要分手，兩人暫時不能正式交往，因此阿權透過情愛消費來側面表意，小翔則透過挪用擬親屬稱謂的方式來暫時規避，保全既有的親密關係並同時拓展新戀情。

光光其實也明白小翔與阿權的關係不只是普通炮友，還多了些感情成分，從他有次向我大力抱怨可以得知：

光光：小翔就是肉體上很渣²⁶，我之前抓到好幾次偷吃（編按：指進入開放式關係以前），他會認很多乾哥哥，白天乾哥哥晚上幹哥哥！我問他到底有多少個，他說可能有五個乾哥哥，這些根本就是乾哥哥乾弟弟小王小三！

（2022.01.25，光光田野筆記，頁 43）

不過最終，光光選擇了暫時隱忍。原因在於他認為兩人目前畢竟僅是「乾哥哥乾弟弟」的關係，此時他推測兩人就算再怎麼「踰矩」，因為沒有取得名分，也不會危及他們原有的交往關係。不過從後見之明看來，小翔與阿權的關係在此刻已經悄悄跨越了友誼的邊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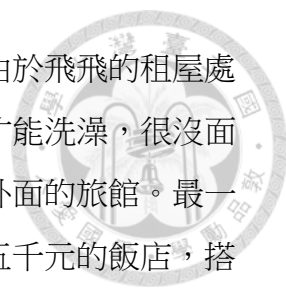
從上述田野資料中，我們可以看見情愛消費對於提升關係緊密程度的正面功能，同時看見身為「弟弟」的小翔如何既服膺性別意識形態、享受來自「哥哥」的情愛消費，卻又試圖掙脫單偶制的性忠貞及情感忠貞義務，透過關係命名的策略來解釋／掩飾新生成的一組關係，拓展自己的性愛情感實踐。在下一款當中，我們將看見與小翔同為「0 號」的飛飛，他對於情愛消費的詮釋並不相同，而這肇因於他貧困的童年經驗以及過往經歷過的階級蔑視。

（二）有情人難成眷屬：情愛消費的尊嚴危機

兩人相遇是飛飛大一那年的事了。大學階段，飛飛靠著學貸、打工以及獎學金度日，租了間學校旁的雅房，在台北還算過得去。上台北不久，他開始使用當時流行的 U T 聊天室²⁷約砲，結識了大他十三歲的大山。起初兩人只是約一夜情，但「因為他的技術實在太好」，往後半年間，兩人又約了十幾次砲，成了會固定見面的炮友。完事後，他們總會躺著聊天，聊彼此的工作與生活，也越來越熟悉對方。從一開始完事後直接各自回家，到會一起過夜，再到週末一起至外縣市旅遊兩天一夜，兩人的感情逐漸升溫。

²⁶ 意指很愛拈花惹草。

²⁷ 飛飛上台北時，智慧型手機與軟體尚未普及，U T 聊天室是當時相當盛行的同志匿名網路聊天室，可挑選不同地區的聊天室加入（如「北部男同志」），並於暱稱直接打上當下的個人需求。



隨著感情越來越好，大山也越來越願意在飛飛身上花錢。由於飛飛的租屋處空間狹小，他不願帶大山回到這裡（畢竟還要穿越室友的房門才能洗澡，很沒面子），而大山又與家人同住，因此每次要做愛時，他們總會找外面的旅館。最一開始他們去三小時六百元的廉價旅舍休息，後來他們下榻一晚五千元的飯店，搭配外縣市的旅遊行程，這些開銷都由大山買單。除了開房間，他們每週也會看場電影，期間約會吃飯的錢都由大山支付，「因為他知道我是個窮學生嘛。」

不過飛飛並不是沒想過要自己付錢，只是當他向大山提議時，總會引發爭執。大山是位私校老師，開了自己的補習班，在台北市也有房子，生活可說是相當寬裕；相較之下，飛飛每個月打工的收入大約一萬元，原生家庭也無力支援，有時甚至還需要寄錢給母親使用，在台北能收支平衡已相當不易，實在難以再支付較高的約會費用。偏偏大山的消費慣習頗為闊綽，且他也不願意調降消費價格、犧牲享受來配合飛飛的消費慣習：

飛飛：大山的生活圈就是那樣，他習慣吃那樣的料理，他的消費就是那種水平，我們開房間也會花四、五千元……跟他相處那幾年我要一直看著自己的荷包，雖然他都說他付錢，擺明了就跟你說不用擔心，真的很像是 sugar daddy²⁸吧？哈哈（苦笑）……他知道我尊嚴很強，但他還是都會搶在我前面一步付錢，如果跟他爭就會吵起來，吵到不行。

（2021.09.11，飛飛一訪，頁48）

透過種種的情愛消費，大山創造出約會情境——週末出遊、出入高級飯店、看電影及逛街吃飯——來向飛飛表達情感，起初這確實令兩人的關係變得比普通炮友來得緊密不少，注入了更多情緒與親密感。但大山持續買單的行為，漸漸令飛飛感到尊嚴受挫：

飛飛：跟他相處的過程我一直覺得好累，覺得我好像都是一個小朋友，被他照顧著，不管是性行為、生活上的物質需求，或精神上的陪伴都是。雖然可以輕鬆耍賴當個小朋友，但我知道那不是我。應該說，我小時候已經受夠了

²⁸ 指涉包養關係中提供金錢的一方，接受方則可能被稱作 sugar baby。

被人家說你就是窮，你就低收入戶的小孩……我過去孩童時代的經驗，我要去服從這樣的體制我才能活下來（編按：考取高分、表現符合期待以換得獎學金），我不喜歡……而「A A制」²⁹就可以取消這件事，讓我知道我是有能力付出的，我們兩個是平等的，我覺得平等這件事很重要。

（2021.09.11，飛飛一訪，頁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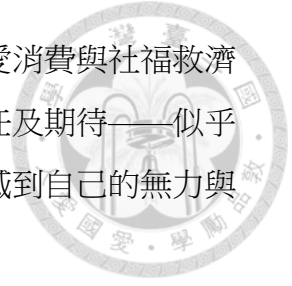
對於飛飛這樣經濟困窘的年輕男同志來說，網路約砲確實給了他機會，讓他跨越年齡與經濟能力的差距認識大山，並且發展出近七年的感情依戀關係。但是大山考量雙方的經濟差異、年齡差距以及出櫃程度³⁰，在構思未來生活藍圖時感到卻步，始終未能答應飛飛的告白。處在這樣「炮友以上、戀人未滿」的關係邊界，大山更需要透過情愛消費來傳遞訊號，向飛飛證明心意以留住對方。

透過多次且越來越高價的情愛消費實作，大山試圖證明他對飛飛的情感是真切的，藉此在沒有交往關係的前提下，將彼此與只有性關係的一般炮友區別開來。不過對飛飛來說，這些展現疼愛的情愛消費顯得憂喜參半，但大山似乎難以理解他的不安。飛飛一方面的確可以藉此感知對方的情真意切，另一方面卻又陷入尊嚴降格的困境，而降格的原因與他童年匱乏的經驗有關。

飛飛成長於家道中落的低收入戶家庭，自國中起即需依賴社會福利團體以及校方供應的獎學金過活，過程中又不時遭受到同儕的階級蔑視，這逐漸確立了他心中對於金錢使用的觀念：唯有自己持有金錢並付出金錢，才能證明自己和他人同樣是位有能力的人，而不是次一等的人。無奈大山的消費能力甚高，在關係徹底終結以前，飛飛始終沒能達成對等消費的形式，總是「像小朋友」般地依賴對方。這與黃克先（2021: 284-285）發現無家者對來自各方救濟的觀點頗為類似：接受救濟的過程中，無家者感到自己低人一等，長久下來會導致尊嚴受損，甚至掏空自我認同的象徵資源。不過在飛飛的例子當中，他接受的是奠基於情感及相互瞭解的照顧而非救濟；照顧是發生在較為親密的類愛侶關係中而非幫助網絡。

²⁹ 意指關係雙方各付各的，而非總是由一方（在異性戀戀愛中通常是男性）付錢。

³⁰ 大山曾提過，他這輩子並不打算向生活圈的任何人出櫃，父母年事已高，教師圈又保守（甚至還一直替他相親）。就這點他倆曾爭執過數次，因為飛飛已向生活圈的所有人出櫃，這是他渴望的生活方式，但大山認為大方出櫃的潛在風險實在太高，始終不願配合。



雖然兩者名目不同，但對於長年接受社福救濟的飛飛來說，情愛消費與社福救濟類同的形式——兩者都不求對等互惠，取消了課予受助方的責任及期待——似乎觸發了他對情愛消費的負向解讀，使他越受到大山的幫助，越感到自己的無力與次等。

飛飛的經歷與 Zheng (2015) 所發現的並不相同：通常 1 號透過情愛消費拉近關係時，也會同時對 0 號課予性忠貞及情感忠貞義務；但在這七年的類愛侶關係當中，由於雙方並未正式交往，飛飛與大山可以各自約砲，甚至期間飛飛還曾交往過兩任男友、大山交往過三任男友。在這段擁有金錢、性愛與情感交流的關係中不存在性忠貞義務以及情感忠貞義務，情愛消費單方向的金錢流轉形式反倒令飛飛聯想到具污名的「包養關係」，遂令他感到尊嚴受損。

無論兩人的感情曾經多麼緊密，期間又包含著多少性愛與金錢的交流，飛飛仍將關係比作一場「不真實的美夢」，因為它沒有透過命名被確立為更制度化且穩固的關係、只發生在私密與非公共的空間當中，且在許多層面都是不對等的。雖然網路交友的確讓飛飛跨越重重阻礙結識大山，這段關係最後仍然解散了。

三、小結

本章當中，我們考察了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尚未步入交往關係階段的性愛互動與情感交流——的獨特困境。一方面，他們需要面對先於性感階序的經濟條件篩選機制，並可能感知到此壓力，但受制於既有經濟條件難以改變自身現況，因此選擇主動退出社交過程；另一方面，在更長遠的會面過程當中，尤其對於 0 號男同志而言，起初情愛消費確實令情感關係變得更加緊密，但由於童年貧困以及歷經階級蔑視的經驗，他們對情愛消費的詮釋可能逐漸改變，從提升親密感轉變為尊嚴受損。

過往已有部分論者指出同志實體消費空間所具備的階級排除特性，其機制源自酒吧或三溫暖本身具備的高消費門檻，或是身體慣習所透露出的階級位置差異導致的排除感受 (Taylor, 2007: Ch6；江紹祺，2018: Ch3；Yu-Ting, Fai, 2017:

Ch5)。本章則進一步指出：身體慣習（包含外貌、衣著或髮型等）所透露出的階級差異，已透過照片及其脈絡等方式延伸至網路空間當中；看似近用門檻較低、具備部分匿名性的網路科技，對於經濟危殆的男同志來說也並非完全友善開放的社交空間。

前項論點也反駁了謝文宜（2009）對於男同志擇偶標準的觀點：經濟穩定並非男同志的擇偶標準（124, 131）。此論點或許肇因於當年招募同志受訪者之不易，經濟能力相對較佳者較有辦法克服污名、參與社會運動以及學術研究，因此謝文宜的受訪者幾乎全為中產階級以上，本研究的報導人則彌補了前述的樣本特性，提供從經濟危殆男同志出發的觀點所看見的經濟排除機制：其不僅存在於實體消費空間，也正逐漸蔓延至網路空間。

本章所呈現的圈內社交圖像尚有未竟之處：我們看見了 0 號報導人綜合圈內性／別角色範疇與貧窮經驗所生的困境，但尚未看見 1 號報導人如何受到這組性別意識形態及其包含的經濟要求所影響，以及他們如何運用既有資源與此性別意識形態周旋。此外，度過了圈內社交、步入更長期且緊密的交往關係，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們將可能面臨不同的難題，這不僅肇因於約砲和交往的互動邏輯不同，也來源自勞動安排以及金錢花用等等。這即是下一章要處理的課題。

第四章

協商圈內交往形式：勞動、性愛與經濟權力



2022年中，一次逛夜市的過程，報導人小翔叮嚀我千萬不能告訴兩位共同的異性戀女性友人這件事。再三確認過後，他才透露了近期這令他既擔心又期待的生活改變——他把原先與光光的一對一交往關係協商為「三方戀愛」，將阿權納入這段愛戀關係之中。

不過，對於多數的報導人來說，擁有一段具有性忠貞以及情感忠貞義務的一對一交往關係（以下統稱為封閉式關係），並且最終步入同性婚姻，才是經營圈內感情最理想的方式。光光是這樣想的，小翔也曾如此理解。然而實際上，眾人的交往關係可能隨著勞動狀態與金錢花用而逐漸改變，從封閉式關係轉變為性愛或是情感方面的開放式關係，這改變的過程即是本章的分析對象。本章的分析目標，則是指出第二章其中的兩種危殆工作調適策略——出讓工時穩定性以及參與性工作——如何令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啟動關係工作，試著協商交往關係的「形式」。此外，本章也將透過區分「對等協商」與「不對等協商」兩種關係工作樣態，檢視同志交往關係中的經濟權力課題。

在下文的分析當中，透過報導人將封閉式關係協商為性愛或情感方面的開放式關係的過程，我將指認出交往關係中通常被視為給定的元素——例如性愛活動、金錢交流、情感承諾等——如何成為關係工作意義下的媒介（*media*），受行動者挪用來進行交易（*transactions*），形成對等或是不對等的協商，並使得交往關係的形式（而非範疇）發生改變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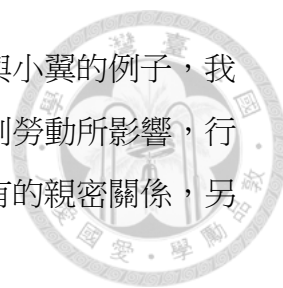
³¹ 在 Zelizer (2009[2005]) 的討論裡，倘若關係的範疇（*category*）改變，意指關係跨越了相連著的邊界，進入到不同的階段（階段一詞在此並無道德高低判斷的意味），像是從曖昧進到交往，再進入婚姻關係當中。不過在田野裡，我發現報導人對關係的協商，不見得僅有維持或解散這兩種非黑即白的選項；反之，他們可能創意地組裝親密關係內涵的元素，沒有跨越範疇邊界，而是在同範疇內（例如同為交往關係）更改關係的形式，藉以獲取最佳個人利益。

一、對等協商的關係工作



過往對於男同志交往關係的研究已經指出（江紹祺，2018: Ch4），由於關係參與者沒有異性戀式二元的性別預期以及同性婚姻的制度約束，男同志的交往關係經常擺盪於兩極之間：一邊是對白馬王子式浪漫愛情神話的渴望，獨尊單偶制的封閉式關係；另一邊則崇尚非專一式的性冒險腳本，試圖實踐非一對一關係，此願望同時受到同志空間基礎建設所增強。近年來台灣的研究進一步指出（陳建勳，2017；楊政銘，2018），由於「開放式關係」的社會運動論述漸興，部分男同志開始以此自我標誌、抵抗社會污名，並主動與伴侶協商交往關係的形式。不過與上述研究不同，本研究中的報導人雖然也正在實踐所謂的開放式關係，但他們並非受到社會運動論述所感召，亦非對於同性婚姻不抱期待，而是受到勞動狀態與金錢花用所影響。更精確地說，他們原本期待經營一對一情感關係，可他們參與的危殆工作，使得原先預期可以從交往關係中獲得的特定元素（例如性愛體驗與情緒支持）消失了。不過他們並不傾向直接解編關係，而是著手協商眼下的交往關係「形式」，維持關係的同時又能獲得個人所渴望的事物。

勞動狀態與金錢花用如何促使同志協商親密關係，同樣是王宏仁（2021）的研究焦點，不過在該份研究中，作者較關切同志如何處理同時擁有兩組看似邏輯衝突的關係（例如交往關係加上家族企業老闆—員工關係，作者稱之為「關係複雜化」現象），尚未觸及同志們如何在維繫相同關係範疇之餘，將交往關係中的內涵元素重新拆解，組建出形式不同的交往關係。此外，王宏仁（2021）也指出他僅描繪了「權力對等」的關係工作，不過如同 Bandelj（2012: 180）所提醒的：「權力是關係工作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即便不是透過直接的物理力量，透過幽微的語言表達，也能夠側面理解關係工作參與者間不對稱的關係（筆者自譯）。」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區分「對等協商」與「不對等協商」兩種關係工作，而界定關係中行動者權力高低的方式，我採納 Wilkis（2018: 13）所提出的「金錢的道德力量（moral power of money）」：Wilks 指出，人們傾向區分金錢的來源與使用的方式是否具有正當性，若兩者皆正當，則能累積個人的道德資本（moral capital），使該人在社會關係中的權力階序上升，也能夠更順利地進行關係工作。



本節將先處理「對等協商」的關係工作，透過報導人飛飛與小翼的例子，我們將看到男男性相關產業的從業者，其原有的交往關係如何受到勞動所影響，行動者又如何來回進行協商，使關係的形式變形，一方面保全既有的親密關係，另一方面也提升了關係中的總收入。

(一) 協商從事男男性相關產業


第一次在田野的 NGO 做自我介紹時，飛飛帶著些許自豪的語氣說他是一名「調教師」。事後他和我說，自己並非一開始就能這麼自在地談論這份工作，甚至他能操持這份工作，也是與老公小翼歷經了重重協商。可以這麼說，為了投入這份高薪的工作，同時為了保全與小翼的親密關係，飛飛付出不少努力，也作出妥協，在勞動內容、性愛以及交往關係之間展現靈活的協商手腕，而他們的婚姻最終也調整為性方面的開放式關係。

在認識小翼以前，飛飛已經在台北的「調教圈」闖出名堂了。大學剛畢業不久，飛飛初次接觸調教這種新型態的性愛方式。對他而言，調教與其他男同志常見的性愛方式是不同的：不同於「一零六九」³²等著重性器官高潮的性愛方式，調教更著重的是由肉身至精神的控制，例如由「主人」對「奴隸」施加身體疼痛、限制行動自由、禁止獲得性器官高潮等等，調教的時間長度也可能達至好幾個小時。因此，飛飛認為在調教過程當中一零六九並不是必備元素，「更像是種點綴，看我要不要加進去。」隨著調教過的人數漸增，身為「主人」的飛飛在調教圈逐漸打響了知名度；為了精進自己調教的手法，他也曾花錢拜師，學習「繩縛」³³的技術，還曾赴日參與過跨國的同好交流活動，獲得不少圈內人肯定。

如第二章所示，在偶然的機緣之下，飛飛將調教從一項個人性愛興趣轉變為長期工作。飛飛在大學畢業後換了將近二十份工作，不斷尋找更高薪的機會。快三十歲時，飛飛在一間情趣用品店擔任店員，那時店長為了打響知名度，開始舉

³² 常見於男同志的用語，取其數字象形意義，一零（10）指涉肛交、六九（69）指涉口交。

³³ 以麻繩捆绑身體，使之呈現特定姿勢的一種調教手法，近年來逐漸流傳至調教圈以外，有時也被視作一種藝術表演手法，並有以之為主題的展覽。繩縛的近年發展請見張哲豪（2014），繩縛的手法與簡史請參考小林繩霧（2013）。



辦各式性愛講座與體驗課程。由於當時飛飛已經是位調教老手，店長請他開課教授調教，並請他開設收費的調教體驗，飛飛也在此時正式稱自己為一名「調教師」，同時晉升為情趣用品店的副店長。起初工作能與興趣相結合令飛飛感到很滿意，可他逐漸察覺到矛盾之處：在調教關係中，理論上，飛飛身為主人應該握有絕對的主導權；但是在店裡進行收費調教時，由於奴隸是出錢的消費者，在這過程中反倒更握有主導權。有幾次，幾位「搞不懂狀況」的客人對他頤指氣使，暴露出這層矛盾，令飛飛更加堅定自行開業的想法。

離開這間店後，飛飛開始鑽研既不直接向奴隸收費，又能透過調教來賺取高薪的方式，因為「我發現我真的專精的很少……如果硬要說有一個技能能在全世界排名到前十 percent，那就是調教。」恰好此時「OnlyFans」這個自媒體網路影音平台興起，開啟了新型態的性工作型式：透過將性愛錄像上傳至 OnlyFans，並在「Tumblr」或「Twitter」等可裸露身體的社群平台上宣傳，拍片者即可吸引並導流粉絲至 OnlyFans 平台付費訂閱，賺取訂閱費。同時，由於上述平台的金流係由美國匯款至台灣，因此目前這項收入來源並不受制於台灣的法規，經營者毋須擔心觸犯法律。自此，調教時飛飛不再向奴隸收費（像是過去在情趣用品店時期），而是錄下調教過程並上網販賣，這讓主奴之間的調教關係不再受到交易關係干擾；此外，飛飛還開設了「調教家教班」，收費教導其他有興趣的新手主人。結合上述這兩種盈利管道，飛飛現有的收入是過去擔任情趣用品店副店長一職時的兩倍之多，每個月可達到七萬至八萬元左右。

上述的調教職涯發展歷程，疊合於飛飛跟小翼由交往至結婚的過程——也就是關係由封閉式走向「性開放」的過程——不過小翼並非從一開始就明瞭飛飛的性愛興趣以及工作狀況。交往頭半年，飛飛已是調教圈小有名氣的人物，但這半年來他都沒有參與任何調教圈的活動。交往半年左右時，他詢問小翼自己是否可以調教他人。起初小翼強烈反對，但飛飛強調過程中不會包含一零六九等性器官的交合活動，且願意告知受調教者的所有個人資訊，甚至答應小翼可以隨時到現場觀看，他才勉強答應。平順度過了幾個月，有次小翼回到共同住處，飛飛問他是否想看調教過程的錄影，原想藉此消除疑慮，不料看到一半對方竟奪門而出，臨走前並丟下一句「你很髒！」——小翼完全無法接受調教的實際情況。

此事發生後飛飛便不再調教，直到他任職情趣用品店的副店長，小翼才勉為接受。也就是說，當調教不（只）是種性愛興趣，而是被理解為一種工作，一種比起其他現下選項優渥不少的工作，小翼才同意讓交往中的飛飛調教他人：

飛飛：我的認知裡面一直是他無法接受開放式關係，所以後來他可以接受我調教是因為我工作，因為我當了情趣用品店的副店長，也開了工作室，那是因為工作的需求……我不可能跟顧客發生情感上的關係，就比如我是色情按摩師傅，我跟每一個客人都想交往嗎？這不合邏輯啊！……我又跟他講很清楚工作細節，且工作時不是只有我一人，他要來探班都沒問題。

（2021.09.11，飛飛一訪，頁45）

飛飛希望從事調教工作，主要是出於生計考量以及長期的職涯發展，近似於王宏仁（2021: 89）所指出的：「親密關係裡頭的經濟行動（編按：此處取求職之意），其意義不只是確認或修復這一組關係的存在，很多時候也是在解決關係中的個人困擾。」然而當飛飛選擇入職調教時，勢必面臨一項矛盾：他倆現下的親密關係存在著性忠貞與情感忠貞義務。為了疏通矛盾，同時解決個人的生存難題，飛飛援用「互斥論」的視角³⁴——可能帶有性意味的勞動過程並不會摻雜性愛及情感——進行區辨與類比：第一，飛飛區辨調教與非商業化的男同志性愛，透過自身衣著完整、協同其他勞動者共同在場、不進行一零六九等條件，將調教構框為純粹賺錢的勞動實作，而非滿足個人私慾的性愛活動；第二，飛飛將調教類比於其他類型的性工作，像是男男色情按摩，指出即便他可能真的以性愛體驗作為勞動成果進行交換，例如直接使奴隸經驗到性快感，或是讓網路上的影片觀看者獲得性刺激，在勞動過程中他都不會與消費者以及勞動對象產生情感聯繫。透過互斥論進行區辨與類比，飛飛得以說服小翼，使他能夠順利入職調教行業。

不過飛飛原先也不贊同各類型的開放式關係，他期待的是從事調教工作之後仍能保有一段封閉式關係，那麼為何最終兩人的關係「打開」了？我認為關鍵就在於飛飛的確在工作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獲得了性愛滿足，亦即上述帶有互斥論

³⁴ 在王宏仁（2021: 110）的研究當中，他同樣發現，在某些情況下（像是面對關係複雜化時），同志伴侶援引「互斥論」的角度才有辦法解決衝突、保全既有的親密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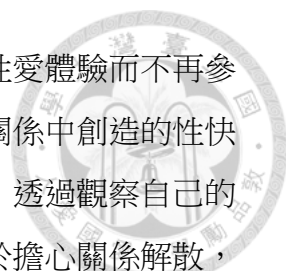
性質的宣言並不完全真確。這個情況也促使小翼也進行對等協商的關係工作，著手改造親密關係的形式。



(二) 協商進入性愛開放式關係

交往一年左右，飛飛開始以調教為全職，也大概在此時，他不再渴望與老公進行「一零」的性行為，甚至只要兩三週自慰一次即可，最久曾兩年都沒有和老公有任何的性行為。「我的慾望到底都去哪了？它總會去個地方吧？」飛飛自省，撇除掉「一零」很耗費體力及需要事先清理等麻煩因素，他對性的慾望其實更來自於控制他人、逼迫社經地位較他高者從事剝奪尊嚴之事。即便調教過程中他需要揣摩奴隸的心境與渴望、像個演員般地展現主人風範，同時要高度留意對方的身體安全乃至精神狀態，這些心神耗費換來的是比「肉體性」性愛更高的滿足感。但是相較於飛飛，交往三年以來小翼卻鮮少能再體驗到性愛滿足。飛飛坦言，「我老公也是個正常人，他當然也會有慾望。」挺意外地，雖然小翼本來對於開放式關係及調教等非典型的親密實作高度排斥，但提議將封閉式關係轉變為性方面的開放式關係的，竟然是時任男友的小翼。

交往第三年，小翼問飛飛自己是否可以向關係外的對象約砲。起初飛飛感到相當受傷，他擔心枕邊人嚐到甜頭後會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就跟人走了，因此大力反對。初次提議的兩年後，亦即交往第五年，兩人正式登記結婚，飛飛也持續從事著調教工作。一次和其他同志朋友的跨年聚會，另外一對男同志情侶分享自己經營開放式關係的正向心得。老公抓準機會再次詢問飛飛，強調交往至今自己從來沒有和其他人約砲，請飛飛相信他的真心，但也請重視他的性需求。飛飛評估，雖然他始終主張調教和性行為是不同的，但在進行調教工作時——無論是在情趣用品店時期，或是自立門戶拍片盈利時——他確實從中獲得了控制的快感。若自己可以但老公不能獲得性快感，「這就是種雙重標準」。即便因為對方是自己的老公，自己會更加珍視、更容易吃醋，但現下的狀況就是不平衡。秉持著雙方都應有機會獲得性快感的立場，聚會結束後，飛飛答應老公能夠向婚外對象約砲，且不必向飛飛報備任何的細節。於此，這段親密關係正式發展為性方面的開放式關係，目前已運作三年，依舊順暢。



調教工作所產生的非預期後果——飛飛因為經驗到調教的性愛體驗而不再參與既有親密關係中的性愛——促使小翼渴望獲得本應能在親密關係中創造的性快感，著手進行關係形式的協商，將其轉變為性方面的開放關係。透過觀察自己的性慾起伏，飛飛發現他原先宣稱調教非性愛並不精確，然而由於擔心關係解散，他也不願使關係形式轉變為性愛的開放式關係。有鑑於此，小翼透過近五年都不曾違背性忠貞義務的實際行動，證明他的情感忠貞程度之強大，不會因為與他人做愛而減損³⁵，同時援引伴侶應該在各方面均對等的關係理想，藉此說服飛飛，使關係形式產生轉變，並且能持續下去。

總結來說，上述田野資料展現了兩次對等協商的關係工作，亦即關係中兩人並無明顯的上下權力位階關係。在第一次的關係工作中，飛飛援引了互斥論來合理化從事性工作的決定，同時保有交往關係並提升關係中的總收入；第二次則牽涉性工作的勞動內涵以及人們對性愛與公平性的追求：為了達到公平性以及疼愛伴侶，飛飛將自己無法給予伴侶的性愛體驗給「外包」出去，證明自己也是在意伴侶的感受的。將性愛體驗給外包出去的行動本身，成為關係工作意義下的一項交易（transaction），性愛則成了媒介（medium），飛飛以之向小翼證明其感情的真摯程度。雖然關係的形式變更了，但兩人仍能保有緊密的關係。

二、不對等協商的關係工作

本節當中，我們將透過光光、小翔以及最後加入的阿權的三方戀愛，檢視交往關係中的經濟權力如何令關係工作成為不對等協商，其表現的方式有二：第一，權力階序較低者難以拒絕對方改變關係形式的要求；第二，權力階序較低者難以主動提出改變關係範疇的要求，甚至遭到解編關係。以下將先討論為何光光會跌落至這段交往關係中權力階序的底層，這與他試圖證明自己的 1 號陽剛氣質的消費慣習有關，也和因此而生的經濟依賴狀態有關。

³⁵ 當然，飛飛的隱憂也是有其經驗基礎的，如第三章第三節所示，男同志之間的性愛活動確實可能產生出強烈的情感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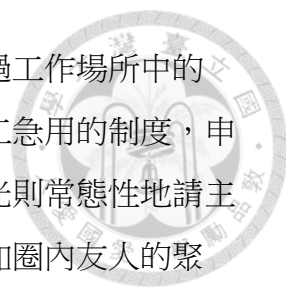


(一) 陽剛消費與經濟依賴

田野的過程中，不時可以見到光光因為花錢休閒的慣習「不佳」，因此和小翔及阿權發生爭執，並且總是居於下風。在原先的兩人關係中，光光就已因為消費慣習闊綽，導致經常得仰賴小翔的經濟支援過活，在日後新組成的三人關係中亦然。最常見的情節是光光先向小翔或其他異性戀友人借錢進行休閒，且通常要等到債主自己也經濟拮据時，光光才會再向他人借錢以清償最迫切的債務。雖然開口的當下很難啟齒，但拿到錢後，身為 1 號的光光經常向其他男同志友人展現出「闊綽」的氣勢。

舉例來說，剛認識光光與小翔的第一個月，這天我和他倆一起逛西門町的公仔店，小翔在二樓看公仔，光光則在一樓夾娃娃。那天他一口氣換了三十枚十元硬幣，在機台旁疊了三大落，接著把我喊過來，要我挑選機台裡的其中一隻娃娃，「喜歡哪個直接說，老子夾給你！」此時小翔正從二樓走下來，看見光光又為了夾娃娃送人而花大錢，氣得當眾破口大罵。光光則刻意忽略小翔，繼續夾指定的娃娃，最終花兩百多元夾了三個，還很熟練地打電話請店家更換娃娃的顏色，得意地送給我。值得注意的是，這天出遊結束後小翔傳了訊息關心我：「光光如果有欺負你（編按：光光在這幾次出遊時會觸碰我的身體）要跟我說喔。」顯示剛認識時，光光將我視為一位可能發展性愛關係的男同志 0 號友人，因此他試圖透過鋪張消費的方式，且不惜與小翔產生糾紛，仍要送我這份他努力掙來的禮物，試圖藉此留下好的印象。

除了上述案例，光光也喜愛在其他男同志友人面前「框」酒錢，在同志酒吧請大家喝酒，透過此等炫耀鋪張的消費方式彰顯他的「經濟實力」。然而在進行上述消費的同時，光光還欠一位異性戀女性友人兩萬元，也還欠著小翔三千元。也就是說，光光試圖證明自己陽剛氣質的消費金錢是「借來的錢」，而非本身即持有的「無債務關係的金錢」。或者可以說，即便光光用來休閒消費的錢不見得真是從他人身上借來的金錢（而是他既有的存款），但因為他處於負債關係中，旁人課予他的責任是優先清償債務，並因此視他其他的金錢使用方式為不具正當性的。



除了以借來的錢鋪張地展示自己的經濟能力，光光也會透過工作場所中的「預領制度」預先參與圈內享樂。預領制度是中餐廳設立給員工急用的制度，申請者可以在發薪日以前的任一天提前領取本月至今的薪資，光光則常態性地請主管每三至五天讓他領錢一次，而他也都會在每次領錢後不久參加圈內友人的聚會，例如吃燒烤、喝酒或是兩週一次的三溫暖性愛行程，這經常導致他在月初發薪時能領到的錢所剩無幾，也因此常常得先向男友或是其他友人進行周轉。

光光上述試圖彰顯 1 號陽剛氣質、維繫圈內社交的消費慣習，使他在與小翔的交往關係中成為經濟依賴的一方。重點在於光光經常是在仍有欠債的情況下進行消費，透過「借來的錢」進行「休閒娛樂」而非購置生活必需品，因此被小翔評價為一位不懂得規劃且不理性的人，成為權力較低者。關於這一點也在我和小翔以及阿田（共同的異性戀女性友人）的私人對談中確認。這天，小翔與光光已經瀕臨分手，小翔和阿田在回顧與光光交往六年來的一舉一動，驚覺幾乎都是小翔對光光發脾氣、指責他的不是，而光光則經常無力回應。光光或許真的經常做出被評價為「不理性」的事情，但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因為他經常要向小翔伸手借錢，才因此總是居於下風。

類似的「陽剛消費」現象也出現在 Zheng (2015: Ch3) 的中國大連男同志民族誌當中。她發現身為 1 號的男同志常被課予類似異性戀男性的經濟消費義務，需以之彰顯自身的陽剛氣質，或是換取 0 號對自己的服從。不過前述研究中的報導人剛好都相對富裕，光光的案例則彰顯了這項經濟義務對於經濟危殆的 1 號男同志可能形成經濟負擔：在追求陽剛氣質的過程中，反倒使自己成為既有關係中的權力低下者。

（二）無法拒絕的開放式協商

至於這段封閉式的交往關係如何變成性方面的開放式關係，最終再形成三方戀愛，則與光光的勞動時間安排有關。雖然做不定時餐飲工作能夠獲取更高的總月薪，但是光光原本能在關係中給予的性愛體驗與情緒陪伴卻消失了，遂令小翔開始構思是否要協商關係形式，保全關係的同時又獲得他認為本應能從關係中獲

得的事物。這項協議聽來刺耳，畢竟兩人心中原先的理想都是封閉式關係，但是最終光光無力拒絕，只能接受關係形式逐步開放。



為何開啟協商，小翔說主因是感到寂寞。交往頭兩年，男友光光正就讀餐旅管理系，那時他半工半讀，晚上跟假日都會到餐廳當 PT 人員。除了工作以外，學校還是有學科考試，期中、期末時也會花上他不少時間做準備。與此同時小翔已經畢業在上班了，做的是連鎖速食店的內場人員，上下班時間非常固定，而他也盡量排白天班，空出晚上的時間來休息。然而小翔的休息時間經常與光光錯開，這情況在光光畢業後也不見改善。

科技大學畢業後，光光繼續在建教合作的連鎖中餐廳上班，但排班的機制仍讓兩人難以碰面。雖然身為正職員工，每個月可以自行安排休假，但每天上班時間其實並不固定。由於餐廳每天所需的內外場人數會隨訂單浮動，領班都是每日凌晨十二點公告隔天每位正職人員分別是上早班、午班或夜班，以及 PT 人員是否要上班、上什麼時段的班。雖然工作時段較不固定，但因為已經做得很上手了，且這間中餐廳的薪資比其他餐廳再更優渥些，光光仍在這裡持續做了四年，這也弔詭地讓他和小翔雖然處在同座城市，卻難以碰面。

「有時候就是，像難過的時候、需要人陪的時候，他偏偏不在，就覺得很無助。我就會想說，去找別人可能會比較好過一點。」因為難以碰面，嚴重時甚至長達兩週都無法見面，小翔明明處在親密關係之中卻經常感到寂寞。不過他也擔心和對方說會造成不必要的壓力，畢竟光光是為了賺錢才無法陪他，並非刻意疏遠，況且這份工作比其他餐廳的薪資還好些。最終，小翔沒有和光光說明他的心情，不過也沒和他提自己渴望找人陪，就逕自開始了單方面約砲。

不出多久，小翔約砲的事情就露餡了。光光極其憤怒，卻無可奈何，不斷詢問有什麼是他可以調整的，他都願意配合，但最終仍困死在兜不攏見面時間。經歷幾次抓包、幾次爭吵後，光光賭氣地說：「既然你能爽，我也要爽！為什麼只有我單方面不能？」因此在交往第三年，他們約定好雙方可以和交往關係外的人做愛且毋需向對方報備任何資訊，只要不跟其他人發展出長期的情感關係就好。

不過就在交往第六年，小翔與光光的感情又從性方面的開放式關係轉變為性與情感都開放的形式，以他們的話來說就是「三方戀愛」³⁶。在小翔眾多的約砲對象當中，有一位乾哥哥阿權和他特別要好，不僅經常會請他吃飯，也會幫他購買捷運月票，或是提供微薄的生活津貼³⁷。雖說原本約定好不可以和他人談感情，但小翔與阿權的感情越來越好。認識四個月時，他們開始秘密交往；再過一個月，小翔決定向光光坦白，三人約好在年底一起吃火鍋，由阿權請客，正式向光光介紹這位「朋友」，而光光也在這次請客中答應了三方戀愛。

光光答應讓關係發展為三方戀愛，其實是基於經濟補貼的一種妥協，且他在既有的交往關係中已經位處權力低點，難以拒絕這項要求。在小翔的詢問之下，光光認為與其拒絕（但這兩人仍可能暗通款曲），不如就暫時答應，倘若磨合過程出現什麼問題，或許還能以此為由嚴正拒絕阿權加入；況且自己跟阿權的性愛角色並不衝突³⁸，倘若真的相處得不錯，也算多了位穩定的性伴侶。不過最大的誘因，還是阿權能夠向小翔提供自己難以提供的經濟補貼：

光光：至少第三個人可以給小翔一些生活補助，例如他吃不飽、可能窮的時候，就可以提供他吃的、買月票給他，對我來講就好像乾爸爸一樣……他主要是想幫小翔，因為他喜歡小翔，然後我，因為跟他還不熟，就希望金錢先分開，不然如果我們吵架不合，他叫我還錢，我覺得會變很複雜。

（2022.02.26，二訪光光，頁6）

來自阿權的經濟補貼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光光與小翔都處在高度經濟不穩定的狀況。雖然光光曾向我說過他和小翔彼此會互通有無，月底誰快沒錢時就先借對方，不過就這兩年觀察下來，通常都是小翔，或者是他們共同的異性戀女性友人在資助光光。話雖如此，小翔自己其實也處在月光族的邊緣。撇除各種常態性的花費，每個月他通常僅剩約七千元的伙食費，原生家庭又鮮少資助他，若自己還要資助光光，生活將更顯困難。透過將阿權納入既有交往關係，小翔不但可以

³⁶ 小翔與光光經常交替著使用「三方關係」、「3P關係」等辭彙，不個就通常使用來說，後者較多指涉性愛關係，少見於用來指涉三人共同經營戀愛關係。

³⁷ 關於小翔如何對他人宣稱他與阿權的關係，請見第三章第三節第二款。

³⁸ 小翔是零號、光光是一號，阿權是不分，理論上阿權和兩方都能在性或情感互動上相契合。

穩定地享有情緒支持與性愛體驗，也有辦法獲得常態性的經濟支援，同時還可能改善光光的生活狀況；光光雖然並不樂見，但他無力拒絕，只能被動接受這不對等的協商，將關係轉變為情感的開放式關係。



（三）無法主動協商關係範疇

在將近六年的交往過程當中，光光曾不只一次向小翔求婚，甚至在關係轉變為三方戀愛後，他也曾向小翔提起過結婚的請求。光光認為，理想上，結婚之後他更能名正言順地向其他人介紹小翔是自己的「老公」，聽來比「男朋友」還要更加穩固堅定。此外，光光也擔憂自己的老後生活無人照顧，畢竟他不太可能花大錢領養小孩，或是到國外做人工生殖，於是他將婚姻當作一種男同志「無兒防老」的安養策略，想與小翔共度老後生活，兩人彼此有個照應。因此從科技大學畢業以來，他曾三次正式地向小翔求婚，不過都以失敗告終。

之所以會求婚失敗，是因為光光已被小翔評價為一位本質上無法自我克制、喜愛衝動消費，且沒有能力進行長遠的規劃的人，甚至在多次教導後仍不調整。這些評價，令光光身處交往關係中權力階序的底層，而他提出改變關係範疇的要求（由交往至結婚）也總能輕易地被小翔拖延或是拒絕。與此同時，隨著光光不斷地被小翔道德降格，小翔也開始思考是否該繼續維持這段已長達六年的感情。這天傍晚，小翔拉上我與一位也認識情侶擋的異性戀女性友人阿田，一起例行性地抱怨光光，這也是我首次聽聞小翔認真地考慮分手：

小翔：我真的會想要結婚，但結婚我就想要找一個比較穩重的對象……就算現在沒錢，但可能以後會有自己的房子、車子，然後分期付款，兩個人一起負擔，有共同的目標那就好好存錢、好好規劃人生。可是光光沒有（氣憤貌），照他目前生活的狀態，感覺不出他有什麼規劃，他只想要談戀愛、親嘴然後摸摸，這是小朋友戀愛，不像是成熟的大人……跟他結婚我會馬上負債十萬吧！

（2022.10.20，小翔預告分手田野筆記，頁 16）

在這次抱怨的一個月後，小翔主動向光光提出分手，結束了與他六年的感情，不過仍持續與阿權在一起至今。



小翔最後選擇將光光逐出關係，除了與金錢持有及其使用方式的道德評價有關，也與他對親密關係範疇的經濟想像有關。從上文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小翔將親密關係區分為「小朋友戀愛」形式（僅在意透過肢體接觸所傳達的情愛，而不關注共同的親密經濟實踐）以及「成熟的大人」形式（雙方共同實踐長期的經濟目標）。對小翔來說，能夠共同實踐後者的對象，才是他認為值得長期交往，甚至進一步結婚的對象。即便眼下小翔的經濟條件其實難以購置房產與汽車，但他視此二物件為結婚的必備元素，以之想像未來，一個雙方經濟條件好轉後的共同未來，並以此作為評價當下親密關係的基準。換言之，繼續交往也難以共同達至此標準者——例如光光——即是一名不夠格的伴侶，小翔也因此與光光分手。

上述的親密經濟實踐，即透過伴侶的經濟實作來作為評價基準，甚至進一步解編關係，近似於趙彥寧（2010: 13-30）筆下的「年輕世代」女同志：相較於「年長世代」的女同志，1990年代在圈內「出道」的年輕世代的女同志們，逐漸開始援引金錢交換的邏輯來評價親密關係中的經濟實作；只是，此處小翔的評價是奠基在對於同性婚姻的理解與肯認之上。也就是說，不同於趙彥寧筆下「年長世代」的女同志對於同性婚姻漠不關心，認為其與自己的未來生活安排沒什麼關聯（趙彥寧，2017: 43），也不同於過往台灣男同志們對於締結同性婚姻的陌生疏離（李忠翰，1998；張銘峰，2002），小翔，以及田野中其他渴望結婚的年輕男同志們，已開始視同性婚姻為一項可能達至的未來生活安排（即便眼下的經濟狀況並不特別優渥），而非一項與己身無關、遙不可及且空洞的法律權利論述。

這項發現，似乎也挑戰了王宏仁（2021: 115）的觀察：「同志的親密關係沒有〔如異性戀般〕清楚的社會腳本、規範」，此處小翔展現出來的親密範疇經濟想像，其實頗為接近既有異性戀式的婚姻想像，亦即從交往轉換至結婚的過程，交往者需要透過購置房產或汽車等大宗財物，來確認並鞏固彼此的親密關係（許淑翔，2020）。這似乎也顯示了在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後，因為同性婚姻已成為可能選項，男同志們更傾向於將伴侶的經濟能力納入考量，並以此來作為評價

對方的基準，決定是否持續維繫既有的親密關係。



三、小結

在本章當中，我們看見報導人對危殆工作的調適方式——出讓工時穩定性或參與男男性工作——促使他們開啟關係工作，透過更改關係形式來獲取原先預期可從既有交往關係中獲得的事物，像是性愛體驗、情緒支持以及經濟支援等。不過上述的關係工作並不見得總是權力相當的對等協商，也可能因為關係中的其中一方長期處於經濟依賴狀態，或是持有及使用金錢的方式不具正當性，致使其道德評價低落，也讓關係工作成為不對等協商。在本章的例子當中，光光身為 1 號男同志所具備的陽剛消費義務，在他窘迫的經濟條件之下反倒成為重擔，令他越是追求陽剛氣質，越是跌落至親密關係權力階序的底層。

此外，本章提供了男同志為何步入開放式關係一種新的解釋：既非欠缺同性婚姻制度所導致的性愛自由（江紹祺，2018），亦非受到晚近開放式關係運動論述所感召（陳建勳，2017；楊政銘，2018），報導人們雖然主要仍認同一對一封閉式關係的價值，但基於勞動內容與勞動工時不穩定，他們主動選擇協商為開放式關係，藉以保全親密關係。

最後，男同志之間的交往關係，似乎也不再如過往研究所描繪的，因為對象難尋，或者因為其中一方通常仍擁有異性婚姻，因此難以構思兩人關係的長遠未來，使得男同志們並不特別在意對方的經濟能力，只求當下能獲取即時的性愛與情愛（李忠翰，1998；張銘峰，2002；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10）；反之，在本章呈現的資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男同志們已開始思考結婚的可能性，甚至如飛飛和小翼，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後不久即步入婚姻。也因此，年輕一代的男同志們似乎正逐步將伴侶的經濟能力納入評價之中。在這樣的轉變之下，經濟危殆的男同志們若要享有穩定的親密關係，恐怕將愈發困難。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從經濟危殆的年輕男同志的主觀經驗出發，將貧窮研究、勞動研究與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帶入台灣的同志研究當中，並嘗試解答以下兩組提問：第一，建立親密關係時，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如何受制於圈內社交的階級排除機制？他們又如何突破障礙，參與圈內社交？第二，經營親密關係時，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考量經濟條件限制與危殆工作狀態後，如何對等或不對等地協商性愛、情感、勞動以及金錢花用？這又可能對關係形式產生什麼影響？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筆者想先呼應貧窮研究所帶來的啟發。如同過往論及異性戀親密關係的都市底層民族誌（Liebow, 2009[1967]；Bourgois, 2022[1996]；黃克先，2021）所指出的，我同樣發現在田野當中，報導人之所以實踐開放式關係，其實並非他們原本就擁有迥異於主流男同志一對一式的親密關係文化價值，因而將交往關係協商為性愛或是情感方面的開放式關係；反之，他們的親密關係實踐近似於 Liebow（2009[1967]: 166）所謂的影子價值體系（shadow system of values）：貧者擁有源出一處、類同卻又與主流價值不盡相同的價值系統，但因為受到有限的政經條件及不利的外在制度影響，導致貧者的親密關係實作受到「折射」，產生出不同於中產階級者親密關係的樣貌。延續這樣的詮釋觀點，有助於筆者避免將田野中的發現詮釋為經濟窘迫的男同志固有的文化——例如過去美國的貧窮研究曾一度認為非裔美國人擁有連續單偶制（serial monogamy）這項「特色」的觀點——而能將詮釋重點放在外在不利的政經條件、年輕男同志擁有的親密文化價值，以及他們如何回應環境並調適實作，協商親密關係。

回到前述第一組提問，我發現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在參與圈內社交及建立情感關係的過程當中，他們的確會被置入由性、性別以及身體所交織而成的「性感階序」，據此進行評價與篩選（林純德，2009: 142）。不過在進入此性感階序以前，其實報導人們還會先遭遇到層層的階級篩選，也就是相對富裕的男同志會透過膚質、髮型、衣著，甚至是軟體上的照片脈絡等線索，據以判讀對方的經濟條件。在此階級篩選機制的作用之下，一個人唯有成為一位體面的（decent）男同志，才有可能進一步被評價為可慾的（desirable）男同志，並順利參與至圈內

社交當中。這項階級篩選機制橫跨軟體的線上互動與實體的線下會面，對危殆男同志們建立親密關係形成許多挑戰。



在線下長期的互動中，倘若男同志們要將性愛關係固定下來，轉變成長期的交往關係，其中一種常見的策略，就是透過共同的金錢消費來表達並確認彼此感情的真切程度，我將此策略概念化為「情愛消費」。情愛消費作為關係工作的一種子類型，大量地出現在經濟危殆男同志的關係範疇轉換期間，這些情愛消費也因為扣合於圈內性／別角色意識形態，也就是符合由「哥哥」照顧「弟弟」的經濟倫理，而能夠提升關係的情感親密程度。不過我同時也發現報導人飛飛對於情愛消費的意義詮釋有所轉變：起初他的確因此感到親密程度提升，不過在感情接近尾聲時，卻因為情愛消費而感到喪失尊嚴。這提醒了我們在分析行動者對關係工作的意義詮釋時，應該要關注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類屬差異（例如此處造成影響的是階級差異），並同時關注行動者過往的生命經驗（像是飛飛匱乏的童年經驗與經歷過的階級蔑視），如此才有辦法理解人們如何詮釋關係工作的意義，以及由之而生的情緒感知，這影響了他們選擇是否接受之。

關於第二組提問，即經濟條件的限制與危殆工作狀態，如何促使經濟窘迫的年輕男同志協商親密關係形式，本文發現危殆男同志們肇因於貧困原生家庭、較低的學歷與工作經歷限制，再加上台灣普遍服務業工作貧窮化的趨勢，促使他們發展出三種危殆工作的調適策略，也就是兼併數份工作、出讓工作時間穩定性以及參與男男間的性相關工作，其中後二者可能會令親密關係中本應可共同創造並享有的性愛體驗與情緒支持消失。不過，面對上述情況，報導人們並不傾向直接解編關係，而是選擇靈活地協商親密關係中的元素、更改關係形式，使關係得以持續保存，並且能夠提升關係中的總收入。

然而上述對親密關係形式的協商也並非總是對等。在光光、小翔及阿權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身為 1 號的光光在追求陽剛氣質、試圖踐行圈內性／別角色意識形態的同時，因為經濟能力限制，反倒使他在過程中成為經濟依賴者，逐漸喪失在關係當中的權力，導致無法拒絕來自小翔的關係形式協商，也無法自己主動提出關係範疇的協商。這項發現顯示：同志親密關係並不見得如同純粹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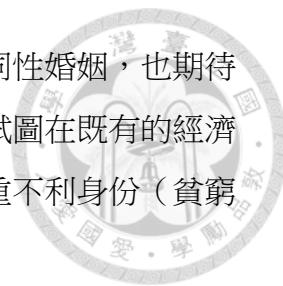
(pure relationship) 所刻畫得這樣理想，關係參與者總能透過溝通達成平等的協商；反之，經濟權力的課題同樣出現在同志親密關係當中，並且早已滲透進關係工作的過程。因此未來研究在援引關係工作的理論架構時，也應同步觀察關係參與者彼此之間的權力階序，而經濟權力，或許僅是權力差異來源的其中之一。

總結來說，本研究發現窘迫的經濟條件與危殆的勞動狀態，其不僅對於危殆年輕男同志參與圈內社交形成阻礙，也促使他們突破一對一式的親密關係裡想，透過拆解並重新組裝親密關係的內蘊元素來解決個人難題，提升關係中的總利益並同時維繫情感，讓情感的形式發生變化。我不認為這是危殆年輕男同志的「特殊文化」所導致的，而是他們面對不利的外在環境所做出的調適。

最後，還有兩項課題未能納入這份研究當中，期待未來的研究者能進一步探索。第一項課題是本研究雖然論及跨階級親密關係，例如飛飛與小翼或是阿淳與其男友的長期交往關係，不過我僅訪談了關係中相對貧窮的一方，而未能探究相對富有的男同志，其如何在跨階級親密關係中維繫日常情感。Zelizer 與 Gaydosh (2019) 針對普林斯頓大學校園中的跨階級同儕的研究已經指出，在跨階級日常互動的過程當中，為了維繫情誼，且為避免經濟差距持續被參與者意識到，低資源者與高資源者均須動用細緻的關係工作技術。舉例來說，高資源者經常動用以下三種策略，像是迴避令雙方感到不舒服的交易、主動替低資源者付賬，以及將關係類比於親屬關係，以此合理化資源流通的行動。將視角拉回台灣，根據 Lin, Z., Yu, W. H., & Su, K. H. (2019) 等人的研究，他們發現台灣的同志親密關係所包含的跨階級關係較異性戀者為多，代表有許多同志都需要在經營日常情感時，不斷地施展關係工作技術，以維繫跨階級的親密關係，我認為這是未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尤其是跨階級同志親密關係中相對富裕者。

第二項有待研究的課題，則是經濟危殆的男女同志們如何近用組建親密關係的台灣法律制度，他們又如何與制度守門人斡旋，像是法官與機構的社工師等。2023 年 5 月 1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修正案》，奠定同性伴侶共同收養孩童的權利，並準用民法關於收養的相關規定，亦即需要透過政府許可的兒少安置機構媒合，且經過機構與法院的評估才得以收

養。在此制度通過以前，光光就已經多次表示他不僅期待締結同性婚姻，也期待與伴侶共同扶養孩子。不過像光光這樣的危殆男同志，當他們試圖在既有的經濟條件之下近用收養制度時，制度守門人會如何評價其擁有的雙重不利身份（貧窮身份與同性戀身份），值得未來進一步考察。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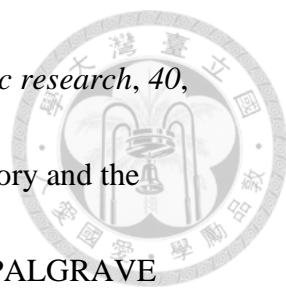
- Bourgois, P. (2022)。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葉佳怡譯）。左岸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6 年）
- Giddens, A. (2001)。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周素鳳譯）。巨流。（原著出版於 1992 年）
- Jamieson, L. (2002)。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蔡明璋譯）。群學。（原著出版於 1998 年）
- Liebow, E. (2009)。泰利的街角（黃克先譯）。群學。（原著出版於 1967 年）
- Stacey, J. (2019)。解套：愛情、婚姻與家庭價值，西好萊塢到中國西部（李屹譯）。游擊文化。（原著出版於 2011 年）
- Zelizer, V. (2009)。親密關係的購買（劉永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2005 年）
- 小林繩霧 (2013)。繩縛本事。基本書坊。
- 王宏仁 (2021)。愛情，像極了投資：同志家族企業的親密關係與經濟。臺灣社會學刊，70，77-125。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010)。彩虹熟年巴士：12 位老年同志的青春記憶。基本書坊。
- 史國良 (2001)。性意識、文化、與政治經濟學：閩南「同志們」的經驗。載於何春蕤（主編），同志研究（頁 51-88）。巨流。
- 江紹祺 (2018)。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香港中文大學。
- 何思瑩、柯志哲 (2021)。性別化的傷疤效果？檢視非典型工作經驗對於臺灣受雇者日後進入典型工作可能性的影響。勞資關係論叢，23(1)，1-33。
- 吳文煜 (2003)。河邊春夢：台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吳佳原 (1998)。城市荒漠中的綠洲臺北市男同志酒吧經驗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李忠翰 (1998)。我的愛人是男人：男同志的成長故事。張老師文化。
- 李金坤 (2008)。餐飲從業人員工作家庭衝突與留任意願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餐旅管理研究所。
- 李慈穎 (2007)。以家之實，抗家之名：台灣女同志的成家實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杜思誠 (2008)。高風險的性？從男同志轟趴參與者的性實作檢視「多重性伴侶」的愛滋風險論述〔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 (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

- 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 林冠廷（2019）。論男同志手機交友 app 的機會與限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林純德（2009）。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載於何春蕤（主編），酷兒新聲（頁 121-180）。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林純德（2013）。「C／娘」的爭戰指涉、怪胎展演與反抗能動性：檢視「蔡康永 C／娘事件」中的「性別平等教育女性主義」論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0，163-214。
- 林純德（2016）。客家「村姑」要進城：台灣客家男同志的認同型塑及其性／別、族群與城鄉的交織展演與政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5，1-60。
- 柯志哲、張珮青（2014）。區隔的勞動市場？：探討臺灣典型與非典型工作者的工作流動與薪資差異。臺灣社會學刊，55，127-177。
- 紀大偉（2022）。回收羅漢腳：《大佛普拉斯》的酷兒華語語系未來主義。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7，71-106。
- 涂曉蝶（2021）。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游擊文化。
- 張宜君、林宗弘（2015）。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續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85-129。
- 張哲豪（2014）。「痛」快：看見台灣偷虐者〔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新聞學研究所。
- 張銘峰（2002）。彩虹國度之情慾研究—以中年男同志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 莊育碩（2016）。「肌」不可失？男同志身體及情慾之初探〔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許淑翔（2020）。當「結婚」遇上「嫁娶」—臺灣婚禮中金錢的社會意義〔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陳伯偉、王宏仁（2018）。男男按摩的身體工作：親密關係的劃界與跨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0(4)，537-569。
- 陳佩甄（2020）。「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文化研究，31，7-42。
- 陳治慶（2014）。遊民的社會排除與被害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
- 陳建勳（2017）。「做」一段開放式關係：男同志的性愛慾衝突與協商經驗探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 陳美華（2007）。「從娼」作為生存策略——家庭、性別化的勞動市場與權力遊戲。女學學誌，24，47-101。
- 黃克先（2021）。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春山。
- 黃紹謙（2019）。男同志肥胖體態、自我認同及互動經驗〔未出版之碩士論

- 文〕。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黃詠梅（2008）。從「性虐待」到「皮繩愉虐邦」——考察台灣愉虐實踐的社群文化與集結政略〔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楊政銘（2018）。男同志單一伴侶開放式關係實踐經驗之敘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研究所。
- 趙彥寧（2000）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207-244。
- 趙彥寧（2010）。不／可計量的親密關係：老 T 搬家三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0，3-56。
- 趙彥寧（2017）。與之共老的酷兒情感倫理實作：老 T 搬家四探。《女學學誌》，40，5-51。
- 蔡孟哲（2009）。躺在兄弟的衣櫃。載於何春蕤（主編），《酷兒新聲》（頁 1-38）。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謝文宜（2009）。衣櫃裡的親密關係：台灣同志伴侶關係研究。心靈工坊。

英文文獻

- Adam, B. D. (2006). Relationship Innovation in Male Couples. *Sexualities*, 9(1), 5-26.
- Bandelj, N. (2012). Relational Work and Economic Sociology. *Politics & Society*, 40(2), 175-201.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R. Nice,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Brim, M. (2020). *Poor Queer Studies: Confronting Elitism in the Univers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ao, A. (2000). Global Metaphors and Local Strateg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s Lesbian Identities.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2(4), 377-90.
- D'Emilio, J. (1983).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In Snitow, A., Stansell, C., & Thompson, S. (Eds.), *Powers of Desire* (pp. 100-113). Monthly Review Press.
- Evans, D. (1993). *Sexual Citizenship: The Materi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ies* (1st ed.). Routledge.
- Heaphy, B., Donovan, C., & Weeks, J. (2004). A Different Affair? Openness and Nonmonogamy in Same Sex Relationships. In Duncombe, J., Harrison, K., Allan, G., & Marsden D. (Eds.), *The state of affairs: Explorations in infidelity and commitment* (pp. 167-186).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Kalleberg, A. (2009).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1), 1-22.
- Kasmir, S. (2018). Precarity. In Stein, F. (Ed.), *The Ope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 Lin, Z., Yu, W. H., & Su, K. H. (2019). Comparing same- and different-sex relationship

- 
- dynamics: Experiences of young adults in Taiwan. *Demographic research*, 40, 431-462.
- Liu, W. (2020). Feeling Down, Backward, and Machinic: Queer Theory and the Affective Turn. *Athenea Digital*, 20(2), e2321, 1-19.
- Taylor, Y. (2007). *Working-Class Lesbian Life: Classed Outsiders*. PALGRAVE MACMILLAN.
- Weeks, J., Heaphy, B., & Donovan, C. (2001). *Same Sex Intimacies: Families of Choice and Other Life Experiments* (1st ed.). Routledge.
- Wilks, A. (2017). *The Moral Power of Money: Morality and Economy in the Life of the Po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s, P. (1981). *Learning to Labou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Yu, T.-F. (2017). *Class Differences among Gay Men in Hong Kong: Local History, Queer Modern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Zelizer, V., Gaydos, L. (2019, January 9). Class on Campus: How Students Manage Everyday Inequalities. *Princeton Alumni Weekly*.
<https://paw.princeton.edu/article/essay-class-campus>
- Zheng, T. (2015). *Tongzhi Living: Men Attracted to Me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